

世界著名地缘政治专家
为你还原一个
真实的世界

Des idées reçues
sur L'état du monde

这是真的，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

那些让人既困惑又
深信不疑的成见

[法]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 著
(Pascal Boniface)

张弛 楚缤 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es idées reçues
sur L'état du monde

[法]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 著
(Pascal Boniface)

张弛 楚缤 译校

这是真的，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7-527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是真的，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法）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著；
张弛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5

ISBN 978-7-5203-3997-1

I. ①这… II. ①巴…②张…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2020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50 idées reçues sur l'état du monde, seventh edition by
Pascal BONIFACE

© Armand Colin, Malakoff, 2017

ARMAND COLIN is a trademark of DUNOD Editeur-11, rue Paul
Bert-92240 MALAKOFF.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01千字

纸书定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
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场灾难”，“特朗普会让美国再度强大”，“联合国毫无作用”，“冷战死灰复燃”，“科技的进步将会避免全球变暖的发生”，“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

关于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总是有无数的成见。它们出现在互联网上，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无法将其摆脱。然而这些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会愚弄我们。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这位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在本书中把这些关于世界现状的成见分类编录，袒露真相，并将它们一一分析击破。

作者简介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1956年生于巴黎。世界著名地缘政治专家，法国著名智库IRIS（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的创建者及现任所长，巴黎八大欧洲研究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自1991年起任《国际战略评论》季刊总编，撰写和主编了60多本有关国际关系的著作，其中多部成为经典，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因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先后被授予法国国家荣誉骑士勋章及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译者简介

张弛，1965年生于陕西杨陵，获新索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深度研究学位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以来，先后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兼任国内外多所大学研究员。已出版法语论著三部、中文著作三部，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法国文学辞条撰写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各一项。

楚镔，1990年生于山西平陆，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前言

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它越来越难以破解，似乎变得日益危险了。因此，人们很容易受到这样的诱惑：第一个诱惑是放弃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努力，而把它的种种问题抛给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研究者去处理。但是这些专业研究者却乐于划定一个封闭的领域，非内行之人不得入内，以便保持他们的垄断地位。第二个诱惑是凡事都极端简化，这同样令人遗憾。人们把对某一现象的解读简化为两组对立的参数（善与恶、朋友与敌人、我们与他人……），这被认为是万能的理解方法。世界被概括为两个组成部分，于是很容易就可以从中选出一个来。然而，简单地谈论国际时事并不意味着要极端地简化它们，即便是专家们的行话也并不是理解世界的智力保证。

国际问题难以避免成见。例如，认为成见充满了大众的头脑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成见^[1]。成见也纠缠着地缘政治学的专业人员们，不管他们是政治负责人、外交官、军官、专家、教师、研究者或记者。有时，如果一些人蓄意散布成见，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成见与他们的信念或兴趣相契合。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成见都是被这些人满怀诚意地传播着。人们复述自己所听到的那些内容，由于他们到处看到同样的事物，因此便对其深信不疑。传播成见的人们越表现出真诚，越恰如其分地相信他们所提出的观点，这些成见就会越强烈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中。成见不仅充斥于互联网中，它几乎到处都存在——报纸、杂志、书籍（包括一些渊博学者的著作）以及政治辩论里。它们常常就像真的一样，并不全然是捕风捉影的，相反，它们看上去似乎并无谬误。由于看到它们广泛传播，人们就对它们毫不质疑。成见往往来自事实，而从这个事实中发展出的却常是曲解。

我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是世界事务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些成见。在按语中阐述了成见的明显性以及这一成见的原因之后（为了更加清楚，在本书中以斜体 ^[1]标注），我试图展现表面现象的反面，即表象所掩盖的事实。

这本书已经拥有了一批读者。这表明公众了解并超越偏见的意愿是

存在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推出了与时俱进的第七版。在这一版中，此前版本中出现的一些成见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美好的迹象，因为它证明该书体现出了它的教育意义，也证明了公众对成见有所了解，并且表现出批判意识。然而，其他的新成见又出现了，这表明我们有必要持续更新这本书。

感谢法妮·维塞伯格（Fanny Weisselberger），她在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 [\[2\]](#)）协助了本书第七版的撰写工作；感谢艾米丽·莱尔布尔（Émilie Lerebours）、奥迪尔·马里翁（Odile Marion）以及马蒂厄·绍普（Mathieu Schopp），是他们保证了这本书在阿尔芒·科林出版社得以出版。

[\[1\]](#) 本书原文的按语为斜体，中译本以楷体标注，单独成页。——译者注

[\[2\]](#) “IRIS”全称为“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是法国的两大智库之一，由本书作者创立于1990年，并一直担任领导。2014年，该所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列入全球顶级智库名单，排名第26位。该所现在已经发展为有招收学生资格与文凭发放资格的高等学院。——译者注

目录

[前言](#)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这是真的吗？](#)

[专家有助于分析事件吗？](#)

[媒体操控了舆论吗？](#)

[“9·11”改变了世界吗？](#)

[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冷战吗？](#)

[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吗？](#)

[战争越来越多了吗？](#)

[存在着一个世界共同体吗？](#)

[外交导致软弱（“这是新《慕尼黑协定》”）吗？](#)

[不再有国界了吗？](#)

[在国际层面，国家不再具有恰当性了吗？](#)

[全球化要让人人接受吗？](#)

[存在着一个主导世界的阴谋吗？](#)

[跨国公司在主导着世界吗？](#)

[军事实力不再重要吗？](#)

[西方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吗？](#)

[贝拉克·奥巴马削弱了美国吗？](#)

[世界是单极化的吗？](#)

[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吗？](#)

[欧洲是政治侏儒吗？](#)

[德国在主导着欧洲吗？](#)

[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场灾难吗？](#)

[法国在国际上已经无足轻重了吗？](#)

[法国对外政策有左右之划分吗？](#)

[联合国不起作用吗？](#)

[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冷战死灰复燃了吗？](#)

[唯有强有力的政权才能统治俄罗斯吗？](#)

[非洲实行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吗？](#)

[非洲是全球化的失落大陆吗？](#)

[伊拉克战争是因石油而爆发的吗？](#)

核扩散将世界置于危险境地吗？
恐怖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威胁吗？
我们在与恐怖主义作战吗？
理解恐怖主义就是为其辩护吗？
气候变暖将因技术进步而得以避免吗？
特朗普会让美国再度强大吗？
特朗普是不理性的吗？
存在着“流氓国家”吗？
穷人越来越多了吗？
“难民危机”存在吗？
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是非政治性的吗？
译后记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这是真的吗？

在公众眼里，书是知识和知识传播的象征。写书的人和普通读者不同。书凝结了作者长期工作的成果，代表了作者的深入思考与深度认识。如今，在互联网和电视的时代，书仍然保留着它独特的地位，因为书意味着参考、查验以及科学的可靠性。

“这是真的，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亲耳听到我的学生们用这句话来强调甚至强化他们所做的证明。认为书里所写的东西就是真理，这是大学生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另外，他们所读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与另一个成见相反。^[1]简单地说，书籍并不都是中立的文本，它满足于叙述事实，将它们重置于其背景之中。历史教科书的例子就很有意思：它们强烈地反映了在其被编写之时该国的意识形态。只要同时查阅法国和德国的旧历史书，对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相同的事实并没有产生相同的描述，更不必说产生相同的解释了。确实，60年来，这两个国家更加亲近了，以至于出现了一本共同的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在德国和法国学生心中，打下共同历史意识的基础”。德国和法国能在共同的历史上达成统一的意见，这证明了双方目前意识形态之接近。但是，历史教科书在这两个国家的联合出版被视为特例，这一事实表明了操作之难。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何时会有一本共享的历史教科书呢？同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教科书中，显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来讲述中东^[2]当下的冲突及其历史的。还有，在东方，中国人和日本人常常在对其历史的书写和重写方式上不甚一致，最激烈的争论是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叙述——对过去的叙述当然有一种对当下博弈的回响：这里的问题是未来谁将在亚洲拥有主导地位？

在教科书以外，当然还存在着许多随笔文章。作者在其中维护一个论点，表明自己的立场。作者有时以公开宣告的方式，有时则以遮遮掩掩的方式，以便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使其拥护他的观点。究其原因，要么是他由衷地相信自己的论点，要么是这样做对他有好处。表面上看来比历史更为中立的那些议题，比如技术的议题（如在经济学之中），或者科学的议题（如在生物学之中），就可以为那些带有作者强烈个人色彩的论点打掩护。打开一本书之前，读者最好了解一下这本书是谁写

的（大学教师、记者还是介入事件的人），是在何时何地写的（所属的国家、机构、时期），为什么而写（在哪个事件之后，或者为了哪些事件的预期），以便推论作者是透过什么“眼镜”来观察现实并转述给读者的。读者有权利要求作者提供可靠的、已被证实的知识（日期、数字、名字等）。然而，不管作者多么努力地去做到具有客观性，他的分析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中立。这就需要读者运用自身的批判意识，比如，增加信息来源以使信息相互印证。

因此，所有写在书里面的东西，当然也包括写在本书里面的东西，都是可质疑的。读者被预警，读书心清醒！^[3]

[1] 作者顺便批评了大学生懒于读书的现象，因为人们都以为大学生会读很多书。——译者注

[2] 原著使用“近东”（Proche-Orient）所指的地区，在中文中则习惯于说成“中东”。本书一律改译为“中东”，以适应中文读者。近代西欧地理学者以“近东”指邻近欧洲的“东方”。西欧人以他们所处的位置为参照，“东方”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包括非洲北部和亚洲西南部，有时还包括巴尔干半岛。在巴尔干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般不再把巴尔干国家称为近东国家，而以“东南欧”或“南欧”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东”的说法渐被“中东”取代，但两者常通用。——译者注

[3] 作者玩弄文字游戏，将法语谚语“Un homme averti en vaut deux.”（有备无患）改为“Un lecteur averti en vaut deux!”这句谚语常被译为“有备无患”，既不准确，也没有谚语的韵味。它的意思是“在预先被警告了需要担心的事项和要做的事情之后，人就会采取谨慎态度和应对措施”。本书翻译即据此而作。——译者注

专家有助于分析事件吗？

专家们在其所研究的领域内，逐渐积累了扎实的知识。与那些常常泛泛而谈的记者相反，专家们自我限于某个特定议题。他们代表了在一个特殊题材上的学识，因而给出的都是科学性的意见。对公众而言，专家就是严肃性与客观性的保证。

在与国际关系同样敏感和重要的一些议题上，是否存在着客观性与中立性呢？肯定不存在！一位专家能够就某个议题发表高深的见解，但他却不能保证其客观性。专家的评判是不以中立性为前提的，因为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个人经历、出身阶层、出入环境等。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期待一位专家给出在理智上是诚实的观点，并根据推理来表达思想，尽管这只是个人的推理。虽然专家科学的观点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主观性，但是却无法摆脱后者的渗入。当专家们仅仅为了能够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将他们引入歧途，信口开河地虚构不存在的大学职衔和不靠谱的职位（或者自称就职于名称很高端、实际上只是空壳的机构）时，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信息被操纵的情形：本身就有问题的专家展开一个假装客观与科学的观点，但他是为一些私人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而发表意见的；他因为信念而赞同这些利益，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些利益构成了他收入的一个来源。在成千上万个例子当中，我们且举出一个：在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前，“专家们”就能够断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谎言，但目的是在公众舆论中为战争进行辩护。这个事实表明：某些专家的作用是操纵舆论，而非开导舆论。总之，必须警惕那些“造假文化人”：他们试图欺骗舆论，而不是开导舆论。

再想一想这样的情形：这些“专家”急匆匆地奔向电视台演播厅去评论一次恐怖袭击，而他们并不掌握调查获得的任何要素，这不是很难堪吗？幸而对他们来说，“说出了的话，就像吹过了的风”。

媒体操控了舆论吗？

为公众提供信息的是媒体，所以，媒体能够选择那些适合它们的信息，从而引导公众舆论。“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的出现，更加增强了舆论格式化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 ^[1]（即英语的“mass media”）因这一事实而自我定义：它们组织了从“一方”向“多方”的通信，且信息是单边的（不与公众互动）。电视是最为卓越的大众传媒。

的确，权力总是想要操控媒体，以便可以引导公众舆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这一政策是自愿执行的，还是心照不宣地被整合到编撰的文字之中（最坏的审查是自我审查），信息都很快被广泛宣传。今天，在很多国家里，媒体摆脱了国家的控制。但是，媒体独立的问题并没有因其私有化而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远未解决。实际上，如果媒体的所有权在私人利益、寡头统治集团或跨国公司手中，那么，除了为公众提供信息之外，这些掌控者可能还有其他打算。至于隶属于某些政党或社团运动的媒体，它们至少还能坦率表明意见。

然而，媒体还做不到对舆论进行完全格式化的处理。在一些国家里，如果根本不许自我表达的话，人们还是清楚官方媒体所说的并不是事实这一点。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人们不相信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的确是真实的。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媒体从属于一种竞争体系。如果媒体严重偏离了公众的接受期待，它们就会遭到抛弃。我们可以说这些媒体都受到了舆论状态的制约和影响，而媒体本身却不影响舆论状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电视频道CNN就被视为联合国安理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 ^[2]，因为只有在CNN的摄像机报道了冲突以后，安理会才会派遣维和部队。在战争时期，舆论战非常激烈，但是，CNN此前对国际信息的垄断地位，因其他电视频道的出现而动摇了。其中，被誉为“阿拉伯CNN”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不可小觑。2005年，在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 ^[3]的全民公决中，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为说“是”做辩护，结果却是说“不”的人们赢得了胜利。 ^[4]此外，互联网和新技术使分散的抗衡势力得以建立，如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博客和论坛的创建。这使得信息借助互联网之后，便不再是单向

的，其传播不再是从“一方”向“众人”，而是从“多方”向“多方”。但是，要当心非专业人士发布的信息质量，更要当心那些企图以发布虚假信息来操纵舆论的人。尽管本·阿里 [\[5\]](#) 或穆巴拉克 [\[6\]](#) 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媒体，但这未能阻止他们的垮台，因为人们已不再受困于信息的单一来源，而是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更多的资讯。社交网络成为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成为对媒体的批判性审视者。由此可见，在媒体和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辩证联系。

在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时代，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已经消失了。那种由高到低的垂直信息模式已经终结了。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公众可以质疑媒体所发布的信息，媒体是在公众的某种监督之下工作的。

[\[1\]](#) “大众传媒”法语说法是“les médias de masse”，与英语说法一样，都是复数形式。——译者注

[\[2\]](#)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作者说CNN是第六个常任理事，是为了说明其对世界事务的巨大影响力。——译者注

[\[3\]](#) 《欧盟宪法条约》由欧盟宪法委员会起草，旨在被欧盟全体成员国统一采用。——译者注

[\[4\]](#) 2005年5月29日，在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中，反对票高达54.67%。——译者注

[\[5\]](#) 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 1936—），突尼斯1956年从法国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从1987年11月7日起，他多次连任突尼斯总统。2011年1月14日，在民众的抗议示威浪潮中，他仓皇出逃。——译者注

[\[6\]](#) 穆巴拉克（Mohammed Hosni Mubarak, 1928—），自1981年10月14日起，多次连任埃及总统。2011年2月11日，在民众的抗议示威浪潮中，他被迫下台。——译者注

“9·11”改变了世界吗？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震动了全球，这是一个改变世界面貌的战略转折点。它使我们落入了全球恐怖主义的境地之中。“9·11”事件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点。

在这里，人们混淆了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轰动效果、惊人外观和它对世界秩序的真正影响。通过电视这个媒介，全世界都直接见证了对纽约世界贸易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袭击。“9·11”事件造成了将近3000人死亡的可怕结果；媒体上循环播放的震撼画面，留在了所有人的记忆之中。“9·11”事件冲击巨大，震惊全世界！谁能想象得到一群恐怖分子竟然劫持了民航客机，为的是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核心发动袭击呢？以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为首的美国情报部门，尽管知道美国面临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一些专家已经提及这种袭击的假设——其中就包括法国情报部门的专家——然而，基地组织与美国之间可用手段与自身力量的不成比例，使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严肃对待这个假设。

但是，在这一地缘政治的地震表象之外，国际关系结构本身并没有被“9·11”事件颠覆。强国之间的势力关系没有改变；通过将盟国拖入“反恐战争”，美国甚至强化了其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尽管美国受到了强硬的打击，但它并没有被削弱。美国强化了其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这是通过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来实现的——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美国对“9·11”事件的恰当回应。中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各自的地位没有改变，而且盟国体系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那些新兴强国得以自我肯定，这不是因为“9·11”事件，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实力的增长。世界曾经需要面对的那些巨大挑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气候变暖、南北 [\[1\]](#) 经济不平等、大范围流行病和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存在已久，但它更加猛烈地对世界进行打击，它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让策划这些袭击的人感到吃惊。如果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解散，在结束了两极对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世界，那么，“9·11”事件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美国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脆弱性，在乔治·布什 [\[2\]](#) 的领导下，美国从中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些结论是错的，

但它们却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使该地区失去了稳定，却既没有撼动那些大的平衡格局，也没有结束一种既有的世界秩序，更没有促成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自最后一次巨大的战略转折（即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以来，世界新秩序一直在进行重组。

[1] “南”指的是南半球和北半球南部，是发展中国家集中之地；“北”指的是北半球北部，是发达国家集中之地。在本书中，作者常常使用“南方”一词指代发展中国家，使用“北方”一词来指代发达国家。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分别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代替。——译者注

[2] 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1946—），于2001年1月20日—2009年1月20日担任美国第43任（第54—55届）总统。——译者注

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冷战吗？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它标志着冷战、欧洲分裂以及东西方对峙的结束。它结束了两极世界的局面。

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时候，人们特意展示了一些照片，表现的是手持冰镐和铁锤的示威者们，在敲击象征着把他们分裂开来的柏林墙。这些照片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拍摄于1989年11月10日，不在于它们呈现了柏林墙这一阻碍的拆除，而是在于它们强烈地勾起了人们的记忆。这是因为柏林墙这个被打开的自由通道并非示威者们推墙的结果，而应当归功于东德共产党在1989年11月9日做出的决定——该党希望以此降低来自抗议民众的压力。

象征着柏林、德国以及欧洲分裂的柏林墙建于1961年，而冷战却远远早于这一时间就开始了。我们不应该把象征与现实、关键日期与政治进程混为一谈。东西方结束对峙历时多年：从戈尔巴乔夫 [\[1\]](#) 掌握权力开始，直到1991年12月8日苏联解体。它标志着“改革” [\[2\]](#) 的几个步骤有节奏地推进着：从关于欧洲共同大厦的演讲 [\[3\]](#)、莫斯科当局对华沙条约组织 [\[4\]](#) 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中程导弹条约》 [\[5\]](#) 于1987年12月的签订，到苏联军队从阿富汗的撤退 [\[6\]](#)，以及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常规武器平衡的接受。1989年10月7日是一个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其成立40周年（也是最后一次周年庆）。他并不同意埃里希·昂纳克 [\[7\]](#) 使用武力去镇压不同政见。柏林墙之所以倒塌了，是因为自从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诉诸武力以胁迫东欧国家走苏联的道路之后，东西方的对峙局面就大大地缩小了，而且，他愿意与西方国家进行真正的合作。一旦不再受到苏联的胁迫，从未获得国家合法性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要消亡。

除了柏林墙的倒塌，促使冷战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接受联合国安理会1990年11月第678号决议。该决议称如果伊拉克未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撤离被其吞并的科威特，那么将授权以武力打击伊拉克。这是第一次，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接受对其盟国采取制裁措施。 [\[8\]](#) 戈

尔巴乔夫愿意为安理会重新赋予其在集体安全之维护中的主要作用——这个作用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所预想的。

[1] 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ueïevitch Gorbatchev, 1931—），1985年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推动了苏联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对外关系上，他缓和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也放松了苏联对其卫星国的控制。1990年，他成为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译者注

[2] 原文是从俄语转写的“perestroïka”，字面意思是“重新建造”（reconstruction）、“重新架构”（restructuration）。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后，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试图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摒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俄文版与英文版同时发行，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的中文版标题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而英文版与法文版就以“Perestroïka”作为书名。该书上册谈苏联的改革原因与目标，下篇系统阐述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他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因而要求放弃以阶级斗争为基点的“旧思维”方式，确立以超阶级的全人类价值为基点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至高无尚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涉及许多方面，既涉及苏联共产党的理论纲领，也涉及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戈尔巴乔夫说：“它实际上包括了当代所有的主要问题。”其基本内容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的三个倡议，以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词语因为戈尔巴乔夫轰动国际社会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而进入许多国家的语言之中。——译者注

[3] “欧洲共同大厦”设想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产物。1988年欧洲共同体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西欧与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贸关系得以打破僵局。苏联与西欧的军事对抗水平下降，欧洲对苏联的裁军建议也开始响应。1989年6月12日至15日，戈尔巴乔夫对联邦德国进行正式访问，提出了建立“欧洲大厦”的设想。同年7月6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欧洲共同大厦》的演讲，倡导不同制度的国家合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全欧合作”的概念，指出可以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如人文、科学技术等。——译者注

[4] 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是苏联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建立的政治军事同盟。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加入北约。作为应对，1955年5月14日，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签署了《华沙公约》。这份文件的全文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译者注

[5] 即美国总统里根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签订的《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译者注

[6] 自1919年独立以来，阿富汗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其内政却一直受到苏联的干涉。1976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国，并在次年就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8年4月，在苏联的支持下，以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首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企图摆脱苏联的达乌德政府。阿富汗国名被改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塔拉基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任总理。阿富汗被苏联拉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1979年3月，阿明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但他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苏联企图联合塔拉基除掉阿明，后者却先发动政变，处死了塔拉基，自己兼任总统。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8万

多人侵入阿富汗，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其他城市，处死了阿明。苏联随后扶植卡尔迈勒建立了亲苏政权。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苏联入侵后，十几支阿富汗抵抗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抗苏斗争。1981年，几个抵抗组织联合成立了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并开始接受美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的军事援助。在国际社会压力下，1982年6月，苏联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日内瓦间接会谈。至1985年年底，在阿富汗的苏军兵力达12万人，喀布尔傀儡政府的兵力为7万人，游击队则发展到10万人，但苏军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1986年2月，苏联被迫表示愿意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同年5月，苏联以纳吉布拉取代了卡尔迈勒。但是，纳吉布拉政权同样挽救不了苏联在阿富汗的最终命运。最后，戈尔巴乔夫决定从阿富汗撤军。1988年4月1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苏联、美国、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和巴基斯坦四国外长，在日内瓦签署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协议。协议包括四项文件和一项关于联合国提供监督的备忘录，要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尔政权互不干涉内政、阿富汗难民自愿返回家园，以及由美、苏提供国际保护。协议还规定：从1988年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苏联军队11.5万人分两个阶段全部撤出阿富汗。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联军人撤出了阿富汗，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正式结束。历时九年多的阿富汗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苏联先后有超过90万人在阿富汗作战，累计伤亡5万余人。另有800架直升机与战斗机、1500辆坦克与数千辆机动车被击毁。苏联每年为此的军事开支为20亿—30亿美元，总共耗资450亿卢布，削弱了国力，从而被迫改变其全球战略。在阿富汗方面，估计有124.2万人死亡，其中80%是平民；另有超过400万人沦为难民，占其总人口的30%。——译者注

[7] 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1971—1989年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领导人。他长期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1月19日，昂纳克宣称：“如果建立的原因还没消除，柏林墙将会屹立大约50年，甚至100年！”同年10月18日，迫于压力，他以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12月3日，他被德国统一社会党开除。1989年11月，民主德国最高法院展开了针对昂纳克滥用职权和叛国罪的调查。德国统一以后，对他的调查转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进行，并对他发出了逮捕令。1991年3月13日，昂纳克夫妇被撤退的驻德苏军送到莫斯科予以保护。同年，在“八一九”事件被挫败以后，苏联名存实亡，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宣布不再保护以前的盟友，昂纳克夫妇进入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庇护。由于德国的压力，昂纳克于1992年7月29日被遣返回德国受审。他因身患癌症而被释放，随后前往智利，与妻子、女儿团聚，两年后去世。——译者注

[8]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限期要求伊拉克遵守之前的相关决议，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并恢复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包括苏联在内的12个理事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译者注

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吗？

恐怖主义、不断的冲突、血腥的内战、难民危机、频发的疫病、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经济危机、气候变暖、资源减少……世界局势似乎每况愈下。

表象是迷惑人的。的确，世界局势确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因为知识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冒犯众怒的局势自然催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切与越来越苛刻的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偏差。战争并不比从前更多，只是我们比从前更多地知情了。大规模屠杀在过去发生得更为频繁，无人会怀疑其存在。此外，发生一场足以毁灭地球的全面核战的风险，不再压在人类头顶。在所有的大洲，民主都在推进着。权力越来越少地通过武器去夺取。

若与过去做比较，而不是以一种理想来衡量，我们就可以说：现状在有规律地改善着。在30年的时间内，有七八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大饥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公众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越来越高。在20世纪，全球财富增涨了20倍，平均寿命也翻了一番，人们可以安享晚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政体内部，种族主义都还存在，但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在南非和罗得西亚 [\[1\]](#)（它已经变成了津巴布韦），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废除了。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中，它已经成为既成的事实。20世纪可以说是女性解放的世纪，要知道在20世纪初期，所有的社会中，女性都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包括投票权。在众多的科技领域，创新数量与专利数量的加速增长，使人们可以对抗资源短缺、疾病和死亡。显然，技术进步并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保证，但是信息与通信新技术（NTIC [\[2\]](#)）使信息可以更好地得到传播。另外，人员流动方式和市民社会 [\[3\]](#)到处都在发展。国家失去了对信息的垄断：个人可以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发布信息。虽然民主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但是，与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相反，目前地球上只有一个集权国家——朝鲜。政府对公民的控制放松了。国际正义开始确立，逍遥法外的独裁行为在减少。

过去被遗忘了，又被理想化了，以至于人们会说“以前更美好”。但是，当今世界中，各种自由都在迅速推进，如迁徙的自由、结婚与否

的自由、选择性伙伴的自由、接受自己性取向的自由、是否生养孩子的自由。

现在，气候变暖成为唯一真正令人不安的事情。此外，由于人类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以及环境的恶化成为真实的现状。

[1] “罗得西亚”的名字源于替英国政府在该地区建立了殖民地的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1853—1902）。北罗得西亚独立后改称“赞比亚共和国”，南罗得西亚改称“津巴布韦”。——译者注

[2] 这个词是“nouvell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的缩写。——译者注

[3] 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指的是独立个人之间的经济组织。这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德语原文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汉语中另有“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和“民间社会”等译法，我们认为“市民社会”的译法最为准确。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联合，唯因他们的独立性，因而是抽象的普遍性的联合。他们的联合是通过他们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组织而建立起来的。”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在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市民”（bourgeois）这个词首先出现在法语之中，指的是住在有定期市场城镇中的居民。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市民社会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国家。政治国家使人们成为公民，而市民社会使人们成为有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并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然而也存在着确定的制度以保证个人的自由，协调个人需要和共同体的集体需要。因此，市民社会描述了现代伦理生活的特征。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独创性区分，有助于理解经济市场在现代社会中的中心作用。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部，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市民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译者注

战争越来越多了吗？

冲突在增多，而大国似乎不能够制止它们，也不能给那些交战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世界两极格局虽不公正，却赋予了秩序。它的结束为巨大的混乱留下了空间，暴力便在其中爆发了。

在对现实的感知和现实本身之间，肯定存在着差距。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冲突，公共舆论因自身对正在发生的暴行无能为力而陷入慌乱。媒体这样做本身是合理且值得欢迎的，却可能给人造成一种战争数量在增加的感觉；然而，实际上，是人们对战争的敌视感增强了。因此，说战争比从前更多了，是不准确的。

我们应该先回顾一下两极格局下的世界秩序。在这一时期，爆发了非殖民化战争、革命或军事政变等大范围战争，造成了大屠杀。在这一时期内，发生了160次冲突，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情况常常惨不忍睹。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政变，至少造成了50万人死亡。人人也都对越南战争记忆犹新。

确实，在苏联解体以后，国际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西方人把苏联威胁的结束与没有战争的世界混为一谈。尽管冷战的结束使某些冲突（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结束了，而其他冲突仍在继续，并发生了突变，比如在阿富汗。还有一些在过去不可能发生的冲突也爆发了，比如巴尔干战争。^[1]

后冷战时代，世界经历了一次种族大屠杀，即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陆发生了多次极其残酷的内战。

如果把冲突分为高强度与低强度——前者指的是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后者指的是每年死亡人数在25—1000人，人们就会意识到：在21世纪初期，与冷战时期相比，冲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在2016年，发生了6次左右的高强度冲突和30多次低强度冲突，而20世纪90年代则分别发生了13次和50多次。伴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上的建立、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伊斯兰国在西非（之前的博科圣地^[2]）的暴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对抗、利比亚的混乱局势、埃及的军事政变、发生在南苏丹与也门的内战，国际冲突再次增多了。但是，俄罗斯与乌克兰

兰的对抗并没有演变成重大冲突，《伊朗核问题协议》签署后，伊朗不再遭受打击，也避免了将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人们注意到，尽管西方国家在科技和军事方面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但是，面对恐怖主义时，这并没有完全保证它们的安全，也没有赋予它们在对外军事行动（在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的失败或不确定的结果）中轻易获胜的可能性。尽管西方国家联盟、非洲国家联盟或阿拉伯国家联盟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但它们却难以立足。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了，国家内部的冲突却仍然猛烈。

然而，对原材料、市场与能源掌控的竞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了。独立主义者们或分离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种族或认同上的对立，再次引起了领土纠纷问题。在冲突的根源上，人们总是会看到相同的东西，如竞争、野心、经济需求或（和）报复的意愿。

[1] 指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尔干地区受到来自南斯拉夫内战的严重影响。
——译者注

[2] 成立于2002年，以迈杜古里为“精神家园”，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激进暴恐的极端组织。
——译者注

存在着一个世界共同体吗？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共同体和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共同体相当。国际共同体以集体利益的名义，试图更好地管理世界事务。每当世界上出现重大问题时，人们就会想到它。所有的人群都分享同一个地球，因此组成了一个共同体。

全球化让世界缩小了。交通、信息和通信新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远方的文化；全球人口流动让各种文化和人群交织在一起。然而，“国际共同体”这个表述被广泛地误用了。很明显，在这一假定的共同体内，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有共同利益。即使不考虑那些非国家性质的参与者（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恐怖主义运动和国际舆论）——它们的行动对国际关系还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且将这个表述仅限于主权国家，这一点也很明显：在这个所谓的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彼此的利益诉求也不一致。

的确，世界不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但是，在面对巨大挑战时，人们只能徒劳地寻求一种共同和集体的评估。世界还尚未出现这样的全球管理者——可以通过没有争议的决定来评判关乎集体利益的事情。人们停留在国家各自的、互相矛盾的利益考量上，而且，人们只是考虑短期的选择（通常被列入选举日程表上），而不是着眼于长期的打算。西方人经常把“西方共同体”和“国际共同体”混为一谈。“国际共同体”偶尔会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灾难发生时，比如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核灾难、流行病蔓延。然而，问题是：虽然边界不再能够阻止灾难，但它却强大得足以使国际社会无法做出集体决定。在这一点上，气候变暖最能说明问题：它对我们产生了一触即发的威胁，这种威胁关乎所有国家（富裕国家、贫穷国家，制造污染的国家或较少制造污染的国家）。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长远的行动，即使国家发展水平不高，也可以行动起来。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的国家还是不能够集体做出强制性的、有效的决定来应对这个威胁。

这样看来，2015年12月，在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 上签署的协定 [\[2\]](#)，在其所有方面，都确实是非同寻常的。

另外，当媒体使用“国际共同体”这个术语时，往往是为了让人想

到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出决定，或者是我们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如果存在着一个国际共同体的话，那么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力量太弱。这就证实了下面这个风趣的玩笑：国际共同体就像尼斯湖水怪一样，大家都听说过，却没人看见过。

[1]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法文简称“COP21”，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第11次缔约方会议。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为期13天。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措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遏制全球气温上升。——译者注

[2] 该协议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简称《巴黎协定》，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译者注

外交导致软弱（“这是新《慕尼黑协定》”）吗？

外交只是软弱的面具而已。谈判常常是一种逃避，为的是不去面对那些可能导致对抗的战略现实。避免对抗的愿望并不能预防冲突的发生。那些和平、繁荣的民主国家对战争不再有兴趣，对那些独裁政权退避三舍。这就是可以概括西方人外交活动特征的“慕尼黑症候”。

《慕尼黑协定》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每当西方强国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它就会被频繁地提起来。该协定签署于1938年9月30日，使希特勒收获了苏台德地区。该地区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而绝大部分居民是德意志人。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抛弃了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这一协定。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换回和平。但是，他们只是让希特勒胃口大开罢了。更有远见的丘吉尔对他们如此预言：“你们需要在战争与耻辱之间作出抉择，你们选择了耻辱，而你们也逃避不了战争。”当时，《慕尼黑协定》受到了法国舆论和英国舆论的欢迎。在法国所做的第一次民调显示：57%的法国人支持这一协定。

从这一史例出发，一些评论者得出了过度的结论：把一切谈判都视为失败主义。但是，并不是因为与另一个大国进行谈判，人们就自动地屈服于后者的意志。此后，每当一个政府在控制局势与卷入战争这两个选项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慕尼黑协定》就像幽灵一般骚动不安。居伊·莫勒 [\[1\]](#) 在为法国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灾难性的军事干涉进行辩解时就提起过《慕尼黑协定》。弗朗索瓦·密特朗 [\[2\]](#) 或赫尔穆特·科尔 [\[3\]](#) 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友善的，因为他们认为后者能够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但是，他们的态度却被自己的政治对手们解读成“慕尼黑精神”。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对话，冷战才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慕尼黑精神”也被用于描述那些反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人们。这场战争远未促进地区稳定和消除恐怖主义，而是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自2005年以来，那些反对诉诸轰炸手段以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人们，受到了同样的指责。然而，正是一场（漫长的）谈判促成了在2015年7月14日签订了一项协议 [\[4\]](#)，该协议旨在达到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一目标。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慕尼黑协定》被重新提起，为的是证明有必要对俄罗斯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然而，多亏了《明斯克协议》^[5]的签订以及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停火才得以实现。停火为的是“避免一个新的慕尼黑”——它可能会在欧洲导致一次普遍的对抗。

问题在于，武力解决的办法并不总是奏效，甚至远远不能奏效，而外交手段常常是解决冲突的最佳办法，因为它就是为了促使对立双方或潜在敌人进行对话而建立的。准确来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武力办法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即使与既定目标相比，情形也是如此。今天，人们所提及的《慕尼黑协定》，更像是一个面具。站在这个面具背后的是新保守主义者们或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西方人利用其军事优势，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其他国家。但这已经完全是不再可能的了。

[1] 居伊·莫勒（Guy Mollet, 1905—1975），法国政治家，1956年1月至1957年5月担任法国总理。在与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谈判失败以后，他的政府认为埃及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援助，因而参加了英国对塞得港毫无意义的占领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封锁。——译者注

[2]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法国政治家，1981—1995年担任法国总统。——译者注

[3]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1930—2017），德国政治家，1982—1998年担任德国总理，他在两德统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了一定贡献。——译者注

[4] 2015年7月14日，在与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六国经过漫长的谈判以后，伊朗就限制发展核武器及解除对其制裁问题，与各方达成了协议。——译者注

[5] 《明斯克协议》是顿巴斯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两个政权的代表，于2014年9月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的停火协议。——译者注

不再有国界了吗？

全球化要来消除国界，国界无法抗拒人员流动与社交网络。领土博弈已经变成了次要议题。无论是对国家首脑来说，还是对平民百姓来说，电话或网络都极大地缩短了时间和距离。在相隔数千公里的人们之间，联系可以是即时的。在一秒钟之内，巨大的资金流量就可以不受阻碍地穿越地球。

人们常常称赞全球化结束了逻辑上的疆域，消除了国界。诚然，由于交通的发展，距离被缩短了；“80天环游世界”不再像儒勒·凡尔纳 [\[1\]](#) 的时代那样，被视为壮举。不再有任何国家可以自给自足地发展——就连朝鲜也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维持着联系。然而，并不能说国界已经终结了。

从地球的北部往南部移动（出于职业原因的个人出行方式，或是出于旅游原因的集体出行方式）越来越容易，在资金上也越来越可行，但是，出于经济原因从南部向北部移民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交通日益便利，但众多国家却施行了严格的签证政策，而签证在19世纪是不存在的。当这一举措不足以使移民们灰心丧气时，有些国家就迫切想在边界建立隔离墙。美国在其与墨西哥的边境上这样做了；西班牙为了保护其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 [\[2\]](#) 也这样做了——这两个地方是摩洛哥面向欧盟的入口。

领土界限仍然是大部分冲突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最初，巴以双方的对立就是包含了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分割（或者不分割）性质的政治冲突，而非宗教冲突。

至于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由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而引起的，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是由于美国企图对中东地区重新洗牌引起的。许多尚未解决的领土冲突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或者中国和日本之间）。巴以冲突不是宗教原因（以色列人并不想使巴勒斯坦人皈依犹太教，巴勒斯坦人也并不想让以色列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而完全是针对领土。至于当下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确，恐怖主义活动不确定会在哪里发生，但是他们的潜在目标可能就建立在国家领土之上，国际社会有责任联合起来共同防卫。难以忽视的是，伊斯兰国已经拥有了一片广阔的领土基础。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国际关系，国界、国土和国家依然是最关键的三个词。

[1]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世界》等。——译者注

[2] 休达和梅利利亚都是西班牙的自由市，位于北非地中海海岸的飞地。它们属于欧洲联盟的一部分，是西班牙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领土。摩洛哥一直坚称自己拥有这两个地方的主权，两国在这方面一直存在争议。——译者注

在国际层面，国家不再具有恰当性了吗？

对于大事而言，国家太小了；对于小事而言，国家又太大了。在全球化之时，民族国家失去了其用途及其中心作用。在国际舞台上，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许多更加活跃、更加灵活的新参与者，不断地挑战着国家的地位，而这些组织的观点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在国际层面，国家不再独揽重要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描述国际关系时，早于我们两代的人们仅仅局限于国与国的关系上，这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今后，我们不能再这样描述了。另外，国家的这种垄断角色从未真正存在过。一些具有宗教使命或经济使命的实体，在其所处时代的国际事务上也行使过实权，比如印度公司 [\[1\]](#)、耶稣会 [\[2\]](#) 以及此前的圣殿骑士团 [\[3\]](#)。在其所处时代的国际事务上也行使过实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主权至上原则和国家中心地位予以神圣化）得以确立，但非国家性质的国际事务参与者们还是幸存了下来。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存在着国家的竞争者。然而，今日的全球化使这些竞争者在数量上更为众多、种类上更为多样、行动上更为积极、视觉上更为显见。这正是以无国界为使命的非政府组织的目标：摆脱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可以建立对它们有利的强大关系，其中既包括与相对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包括与贫困国家的关系。国际舞台上的一些其他非政府角色更有灵活性、反应更快、程序也更简单（例如，在1999年的西雅图世贸组织峰会期间，互联网的使用让反全球化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尽管国家不再具有垄断地位，它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参与者。其他的所有参与者，从非政府组织到跨国公司，都将其活动指向国家。无论一个跨国公司（以及向国家施压以维护其利益的那些压力集团）的实力有多强大，最终是国家来确定投资规则和劳工法，更不要说基础设施的建设了。非政府组织能够推动某些规则的确立（例如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为气候变暖而抗争、药物专利的期限等），但最终还是由国家来决定是否批准相关协定，是否确立这些规则。在代表国际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失去了垄断地位，但它依旧在国际舞台上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一个国家变得过于弱势，不再能发挥其主权特性

时（即成为破产的国家），对该国的民众与环境来说，国家就变成一个危险之物。

[1]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494年6月7日，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西班牙人）的调停下，两国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签订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即《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根据该协议，两国将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明确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00里格（约1770公里或1100英里），大约位于西经46° 37' 的南北经线为两国的势力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这条分割线也被称为“教宗子午线”。1500年，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意外越过子午线，并发现了巴西。1512年，葡萄牙在太平洋发现了极富经济价值的香料群岛摩鹿加。1521年，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通过南美洲南部也到达了亚洲，并在摩鹿加登陆。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摩鹿加群岛地理坐标的可靠方法（18世纪才解决了该问题），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声称，根据《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摩鹿加群岛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两国大打出手，就连教宗出面也无法达成调解。1529年，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使西班牙陷入了财政危机，不得不向葡萄牙借款，被迫同意了葡萄牙提出的条件，放弃对争议群岛一切的权利。同年4月，两国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双方约定：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 的子午线，作为两国在东方的分界线。其他欧洲国家想要经营殖民地，就把目光转向了亚洲南部和东南部。当时，以印度为中心，将从海路向东可以抵达的地区称为“东印度”，将从海路向西可以抵达的地区称为“西印度”。在宗主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常常是由得到了宗主国特别授权的一个公司予以垄断。这个公司就叫作“印度公司”。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典都成立过“东印度公司”，其中以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创立）最为著名。该公司甚至在印度长期行使政府职能。中英鸦片战争就是由于该公司对中国的不法鸦片贸易引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创立）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进行殖民统治。另外，荷兰、法国和瑞典也都成立过“西印度公司”。——译者注

[2]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最著名的修会之一。1534年，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耶稣会。1540年，教宗保禄三世批准该会，直属于教宗管理。1773年，在法国的巨大压力下，教宗克雷芒十四被迫解散该会。1814年，教宗庇护七世恢复了该会的活动。耶稣会对候选人的要求极为严格，特别重视其灵性程度与智力水平，并对修士进行长达数年的学术训练。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也在欧洲本土活动，以抵御新教改革的影响。在美洲的耶稣会修士，曾经强烈批评和抵御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奴役，遭到殖民者的仇恨和杀戮。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达广东台山上川岛，次年病卒于该岛。嘉靖三十九年（1560），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1552—1610）获得许可，进入广东，随后抵达北京。他的译述以及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译者注

[3] 圣殿骑士团（Ordre du Temple）是存在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军事修士会，是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其成员称为“圣殿骑士”（les Templiers）。原作以“圣殿骑士”指代“圣殿骑士团”。——译者注

全球化要让人人接受吗？

政府负责人和专家们不断宣称其面对全球化时的有心无力。从技术、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之中引发出来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人们不能与之抗衡。阻止其运动或改变其进程，都是不可能的。

面对全球化 ^[1]_____（或者使用“globalistion”来指代“mondialisation”，这样可以在形式上接近英语中的“globalization”一词）有心无力的论调常常被提出来，为的是让一些决议得以通过。实际上，这些决议无关乎绝对绕不过去的义务，却完全是特殊的政治选择。人们常常提起全球化，以迫使低工资者减少诉求（否则，这些工作就得迁移到南部国家与东部国家），以允许处于等级链条顶端的人们以快速持续的方式增加收入（否则，那些有才能的人就会移居到其他国家去）。全球化是什么呢？它是新技术手段对国界的消除（新技术手段使人们拥有了更便捷的通信、交通和联系），是资本流动的一种最大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从结果来看，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民主价值与经济繁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就是全球的美国化，是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为了一个去人性化的世界，对人的各种认同的质疑。然而，事实上，不管我们满意不满意，全球化就在那里：人们肯定不会取消互联网，肯定会在便捷的通信方式上倒退回去。这一判断源于一个语汇的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抗议全球化处境的“反全球化者”（antimondialistes），自己重新命名为“另类全球化者”（altermondialistes）^[2]——这个词意味着另一种全球化是可能的。的确，全球化是卓有成效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有数亿人跨越了贫困线），但是，它并不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会公正；相反，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现象。然而，这种状况并非不可改变。与我们常常听说的正相反，全球化不是一个难以停止的机械过程，它可以成为计划，其轮廓是由政治选择来决定的，一切都取决于所采取的决策，全球化可以极好地被纳入政治框架之中。今日的决策者们可以不同于往昔的决策者们。他们对于全球化并不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他们甘愿如此。全球化的博弈就是它的调整。

[1] 此处原文使用了“la mondialisation”一词，字面意思是“世界化”。——译者注

[2] 法文中“antimondialiste”意为反对全球化，质疑全球化给世界经济、社会和生态带来的影响，而“altermondialiste”则包含两层意思：质疑全球化，同时强烈要求其他形式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模式。——译者注

存在着一个主导世界的阴谋吗？

共济会会员、犹太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1\]](#)、美国、秘密会社、跨国公司等，都常常被指责在幕后主导着世界，操纵着国家元首和政府。然而，他们只是“单纯的”实施者而已。

人们难以知晓国际决议是如何做出来的。面对这一奥秘，将决定权归结给这个组织或那个团体会令人感到一丝安慰。这样的解释让人感到舒适，因为它让人们不必多想就可以得到答案。但是，他们所做的决定并不总是代表着普遍利益，这就诱导人们认定：做出决定的是想要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团体。全球化使权力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地方，让它难以被辨认出来，这就阻碍了人们对权力的理解。

但是，这些解释是经不起检验的。世界是如此多样化，国际事务中又有那么多的参与者，因此，不管一个团体多么强大，多么富有组织性，它也无法将自己的看法强加给所有人。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国际事件都是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这些组织团体饱受诟病，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美国被人们指责，正是基于这一简单的事实：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无可匹敌的地位。共济会成员则是以秘密的方式来集会，他们曾经长时间遭受迫害。他们可以施加某种影响，以支持对自身有利的观点；他们还要求团结一致。然而，把主导世界的权力归于他们则纯属幻想。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与三边委员会 [\[2\]](#) 将有影响力的人士聚集在一起，在“查塔姆研究所 [\[3\]](#) 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协商。该原则有这样的意思：辩论的自由依赖于其不公开的特征。这就让人怀疑他们是在策划着阴谋。因其定性，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以不公开的方式来展开行动的。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地方，尽管也承担了一些责任，却不是决策场所。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地位要高于其人口权重。但是，认为犹太人主导世界的说法（这样说意味着全体犹太人都同意该观点）则属于传统的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末，沙皇的秘密警察伪造了《锡安长老会纪要》 [\[4\]](#)，宣称犹太人有一个以主导世界为目标的世界性阴谋。

事实上，阴谋论使人意志懈怠：如果存在着一个主导世界的阴谋，

那么，人们为自由、透明、进步以及人权所做的战斗，就注定是要失败的。阴谋主义的论调不仅是为了不去理解而创造的借口，也是为了毫无作为而找出的托词。

但是，揭露阴谋主义的论据不应该引发对影响战略的否定。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实做出了努力，为的是在1953年推翻伊朗的摩萨台 [5] 政权，并在1973年支持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尔特 [6] 上台；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都致力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推广；像其他国家动用自身手段那样，美国也确实施加了影响策略，以便赢得舆论的支持。如果对阴谋主义论据保持警惕是合适的话，这不应该妨碍人们对影响策略保持清醒。对阴谋主义的揭露不能走向同样危险的反面，即批判意识的缺乏。

就像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乔治·布什宣称伊拉克存在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样，国家谎言同样滋养了“阴谋论”。

[1]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le club de Bilderberg）是世界级的年度非官方会议，与会者约有130位，多为商人、媒体人及政治精英。该俱乐部每年开会，却拒绝任何媒体采访，也不透露任何会议内容，并在开会地点动用大量军警维安人员阻挡外界靠近，各国主流媒体也不报道这场会议。——译者注

[2] 三边委员会（la Trilatérale）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是非党派的讨论性团体。该委员会于1973年7月由美国亿万富翁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915—2017）建立，目的是建立美洲、欧洲和日本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译者注

[3] 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正式名称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是位于伦敦的非营利、非政府智库。其使命为分析国际事务与时事，并推广其认识，被同业认为是国际事务领域的世界性领导机构。——译者注

[4] 《锡安长老会纪要》（Le protocole de sages de Sion）是1903年在沙俄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译者注

[5] 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1953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但在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政变推翻。摩萨台是作家、行政官员、律师、议员和政治家，具有王室和贵族背景。——译者注

[6] 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智利总统、智利军事独裁者，智利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统治智利长达16年。1973年，他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右翼军政府。——译者注

跨国公司在主导着世界吗？

全球化让跨国公司作用更大，实力更强。某些跨国公司的营业额甚至超过了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在重大决策上，它们将在幕后施加更大的影响。

我们难以否认跨国公司（FMN）所取得的发展规模。它们在金融和经济上的分量使其得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形中，这甚至使它们以铁腕介入国家事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1973年，美国ITT公司参与了智利的血腥军事政变，推翻了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人们常常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了第三世界的资源（例如石油公司）、参与了文化同化（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廉价雇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例如位于墨西哥的美国加工出口工厂^[2]）、利用童工、不尊重自然、置当地居民生活于危险之中（1984年，位于印度博帕尔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3]化学工厂发生爆炸，造成数千人死亡；2013年，孟加拉国拉那大厦坍塌，造成1100多人死亡）、对某些政府实行颠覆政策或支持独裁政府……简言之，人们指责跨国公司将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他者，其中就包括一些民主国家政府。相反，没有人正视这一点：与其他公司相比，跨国公司的雇员拥有更多的权利和福利。

跨国公司集中化的进程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一个特定的经济领域，某些跨国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越来越与来源国脱节，寻求摆脱领土范围的束缚；哪里回报率最高它们就去哪里，它们遵循的是服从于营利性要求的成本/机会的逻辑。因此，它们很少考虑人类的命运。

然而，国家保持着对公共政策的掌控：教育、医疗、基础设施、颁布包含税法在内的法律规范、投资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虽说引人注目的实力是跨国公司的一张王牌，但这也会转化成弱点。即便只是出于商业原因，跨国公司也应该在公众和消费者面前保持一个积极的形象。对跨国公司产品的抵制运动会把它们置于巨大的困境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RSE）建设的进程中。而企业社会责任是将社会、环境和伦理标准强加到整个生产环节之中，这样，跨国公司就显示出其良好的生态与社会形象，消除了争议，打开了新市场。跨国公司引人注目的特性是一张王牌，同时也是一个弱

点：当它们的行为不恰当时，将会面临潜在的负面舆论压力。

[1]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医生出身的智利政治家。1933年，他参加创建了智利社会党，曾两次出任总书记。1937年起，他历任众议员、参议员、参议长、泛美医生联合会主席等职。1970年，他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人民联盟政府，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任自由竞选获胜的总统。他对铜矿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这些举措触动了美国公司的利益，也遭到右翼军人的敌视。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帮助下，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以身殉职。——译者注

[2] 此处原文是西班牙语“maquiladoras”，指外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的保税区内开办的工厂。它们专门使用免税输入的材料和设备以及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通常又出口给外国公司的来源国。——译者注

[3]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创办于1898年，是美国的主要石油化工公司，现为美国陶氏化工的全资附属公司。——译者注

军事实力不再重要吗？

在冷战结束以及苏联威胁消失之后，人们经常谈论“和平红利”。^[1]它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它可以大大减少世界各国的军事开支。

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2]导致苏联和美国投入到耗费巨资的军备竞赛之中。军备竞赛相对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却完全拖垮了苏联。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和日本这样被剥夺了战略自主权的国家，经济却似乎异常繁荣。以军事力量作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已经过时了，对此观点，我们持保留意见。有人会说：1990—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联合国难道没有成功地使集体安全原则发挥作用吗？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军事开支，已经不再是必需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不仅不再有助于国家安全，而且相反，会削弱国家安全。

然而，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国防开支的份额与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比例并不是太明显。确实，苏联将其15%或者20%的财富投入到了军备中，它的发展因此受到限制。但是，苏联体制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官僚主义、缺乏积极性等）。相比之下，日本的国防开支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它的经济却健康地发展着。但是，人们还是能找到相反的例子：中国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0%，它的经济状况却好于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的众多非洲国家。另外，除了1990—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那一段时间，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保持国防能力就是保障自主和独立的条件。

在一个不完全由正义支配的世界里，拥有国防实力总是可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独立。相反，过度依赖其军事实力以解决政治纠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战略错误，扩大不安全的程度，正如2003年以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所表明的那样。尽管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具有军事优势，但它还是失败了。对于外国干涉势力来说，“镇压暴动”的战争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今天，仅美国一国的军费就占了世界军费的36%左右（SIPRI^[3]，2015），而美国却没有因此觉得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此外，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军备竞赛却仍在继续，而且是以相当非理性的方式在进行着。

[1]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敌对方结束敌对状态之后，给该经济体带来的额外好处。——译者注

[2] 此处特指1945—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译者注

[3] 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译者注

西方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吗？

如果西方仍然主导世界的话，它越来越受到亚洲强国与伊斯兰强国的质疑。人口走低的“白人”世界，有被淹没的危险。

从 15世纪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一直在主导着世界。随后是美国接棒，它较为轻松地应对了来自苏联的竞争。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时期内，苏联与美国旗鼓相当。然而，一部分西方人还是担心自身实力会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先明白“西方世界”的定义。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西方世界”仅仅指的是欧洲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吗？如果它指的是“白人”世界，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或者说它指的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包括日本和韩国？由此可见，对“西方”的定义可以是多样化的，对于威胁西方的对象，其定义也可以是多样化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被视为对欧美经济安全的一大威胁。但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再这么看待了。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带来了人口压力与移民压力，伊斯兰教扩张造成了政治压力，印度和中国这两大实体经济发展迅速，带来了经济压力，这些压力让西方人感受到了威胁以及自身有利位置的丧失。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1%，欧盟占了23%，日本占比超过了6%），它们是世界原料和能源的主要消费者，它们的货币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它们掌握着经济命脉，占据了军事优势。

但是，仅占全球人口总数1/6的人，却使用了世界5/6的财富，这是可以理解的吗？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以中国为例，这可能几乎只意味着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只可能让它从现在到21世纪中期，恢复到其在19世纪初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份额。其他新兴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南非，它们至少自我定位为区域性强国，而且这些国家在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之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如果所有国家要保留主导地位的想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并非所有的手段都是恰当的。因此，如果西方世界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现存的力量对比关系，而且企图采取武力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那

么它们不仅会失望透顶，更会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如果它们接受彼此间的某种再平衡，那么，它将会更容易地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者，至少可以控制其地位被挑战的状况。虽然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在实力上的垄断地位，故而必须和其他国家分享权力，但是，它毕竟还是较为强大的；它不再拥有财富的垄断地位，但仍然是最为富有的。

贝拉克·奥巴马削弱了美国吗？

伊斯兰国的建立、面对巴沙尔·阿萨德 [\[1\]](#) 时的软弱无力、中国作为强国的崛起、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未能将和平带给中东：贝拉克·奥巴马 [\[2\]](#) 被指责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反应、软弱无能，导致美国在世界上逐渐失去了领导地位。

在 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看来，他所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强调恢复这一地位的必要性。

奥巴马认为自己被选为第44任美国总统，为的是结束乔治·布什将美国所卷入的那些冒险战争，而不是为了发动新的战争。他优先考虑的是将美军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有计划地撤出。然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上所建立的伊斯兰国，使共和党人宣称：如果说布什赢得了伊拉克战争，那么，可以说奥巴马丢失了伊拉克。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因为该地区目前的灾难性局面正是源自美国在2003年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叙利亚，人们可以指责奥巴马未能遵守他所设定的红线：他曾指出，在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进行干涉。但是，2013年8月，当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被证实之时，奥巴马却没有对其采取任何行动。然而，他的无所作为，由解除叙利亚化学武器军火库的协约而得到了弥补——俄罗斯也赞成这一协定。面对叙利亚内战，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现得软弱无力。俄罗斯选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奥巴马、西方世界和海湾国家都不想卷入大规模的冲突中，因为伊拉克的反面例子就在眼前，西方在该地区的军事干涉还可能会引发出众多的问题。

一些人批评奥巴马不配获得在2009年授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未能在解决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向前推进：在要求以色列停建殖民区 [\[3\]](#) 之后，他接下来的行动却软弱无力，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4\]](#) 则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支持。 [\[5\]](#)

但是，在本·拉登被消灭之时，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在巴基斯坦和也门，奥巴马大量使用无人机以清除被美国认定的那些恐怖分子；签订于2015年7月14日的《伊朗核问题协议》，使美国和伊朗在36年的敌视

之后，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同样，他促使美国与古巴恢复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中断了的外交关系；最后，他极大地改善了美国在乔治·布什两个任期结束后已十分糟糕的国际形象。

美国的“相对衰落”与其说是源于它自身的特别行动，不如说是源于其他大国的出现。“相对衰落”是一个结构性的演变。奥巴马没有加快这一进程，而是延缓了它。因此，在完全保留了美国特异性的同时，奥巴马采用了比其前任更加“多边主义”的方法。

奥巴马的哲学可以用下述方式来概括：美国不能单独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奥巴马还表示，军事干涉不能成为构成美国领导地位的唯一或主要部分。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实力在上升，但是，美国在这一领域仍然遥遥领先。2015年，美国的就业人口失业率下降到5.5%这一极低的比率。即使美国经济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它已经走出了2008年的严重危机。发生在奥巴马任期内的页岩气革命，使美国重获曾经失去的能源自主性。与乔治·布什相反，奥巴马投身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斗争之中。

美国的活力一直都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首位，美元也一直是世界货币的参照物；美国的公司众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新科技领域（如微软公司、谷歌、英特尔等）。美国对全球精英来说极具吸引力，它继续展现出非常卓越的包容性，它的大众文化（如电影、音乐等）在世界上一直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美国社会、美国生活方式，让很多人梦寐以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仍然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就是“软实力”。

奥巴马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的行动受到局限。但是，一大部分美国人总是相信单极世界和美国“明显命定了领导世界”的神话，而没有意识到这一重大演变。

[1] 巴沙尔·阿萨德 (Bachar al-Assad, 1965—)，现任叙利亚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叙利亚复兴党总书记，已故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之次子。2000年、2007年和2014年三次当选总统。阿萨德家族长期以来统治叙利亚。——译者注

[2] 贝拉克·奥巴马，下文简称奥巴马。——译者注

[3] 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区。——译者注

[4]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1949—)，生于特拉维夫，以色列政治人物，他是以色列第九任总理（1996—1999年）和当时利库德集团的党魁，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

一位在以色列建国后出生的总理。2003年任以色列财政部长。2005年8月9日，因反对时任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的政策而辞去财政部长一职。2005年12月20日他再任利库德集团党魁。2009年3月31日，他再次出任以色列政府总理。2015年3月17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第20届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译者注

[5] 2015年3月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获属共和党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邀请，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博纳并无事先通知时任总统奥巴马。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国会演讲时，全体共和党的议员起立鼓掌，但民主党的议员则有50多人退席，时任总统奥巴马也拒绝接见内塔尼亚胡，并在一些媒体访谈中称，内塔尼亚胡对中东没有建设性的价值，也没有新建议。——译者注

世界是单极化的吗？

美国实力是无可匹敌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美国主导世界，这是史无前例的。

确实，目前尚未有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可与美国相匹敌。美国不再有像美苏争霸时期那样与其国土面积相当的对手。对欧洲来说，它缺少的是统一性与战略力量。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达到美国的1/3，而且它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华盛顿的保护。中国还在很多方面实力不及美国。即使俄罗斯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的衰落，但它还是不能恢复到苏联时期的实力。

当人们考虑国家实力的四个主要标准（经济实力、战略实力、广义的文化实力、技术实力）时，在每一个单项标准下，美国都独占鳌头。如果以四项标准来整体衡量，美国肯定排名第一：美国拥有超过18万亿美元的财富，国内生产总值全球第一；美国拥有3.18亿人口，这确保它有一个持续性的内部市场；美国是预计人口保持增长的少数西方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入境移民有关）；美国拥有全世界近乎一半的专利。对每个国家来说，无论好坏，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都是与华盛顿所建立的关系。

然而，世界不是单极化的，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单个国家不能企图支配世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一个真正单极化的世界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将毫无困难地管理这样一个国家：它拥有2500万居民，经历30年的独裁统治，遭受了12年的禁运，发生过3次比较大型的战争。美国将会做到把和平强加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这种和平既不会与华盛顿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同盟相抵触，也不会与美国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需求相矛盾。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大小，无论其是以尖锐还是温和的方式来质疑美国的霸权，美国都将毫无困难地要求它们遵守秩序：譬如，伊朗将会停止其核计划，而不需要谈判12年。

全球化、国际事务参与者的数量增加与多样化，以及世界性挑战的

规模之扩大，都使单极化成为一个过时的提法。如果因美国现在拥有优势就说世界不是多极化的，那么，基于全球化这一事实，世界也不是单极化的。奥巴马也描述了这一状况，他表示，没有美国，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但是，单靠美国，也无法解决任何全球性问题。然而，我们无法确定美国国会议员们和美国舆论是否完全意识到了这种现象。

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吗？

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在那里，莫斯科捍卫着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想要推翻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土耳其所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该国似乎处于内战边缘，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暴力的重启、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对峙的升级、伊斯兰国的巩固、恐怖主义威胁普遍加剧……

人们感觉到来自多方的暴力：塔利班在阿富汗重夺地盘，也门战火弥漫、血光漫天，南苏丹的情形也是如此，刚果民主共和国总是稳定不下来，伊拉克和利比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西非的伊斯兰国（即前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一直很猖獗，暴力活动在埃及也未能得到控制，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签订和平协定。实际上，战争已经成为日常景象的一部分，媒体对冲突的报道与日俱增，这使得舆论非常担心。

在这样的气氛中，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测越来越多地被提及。然而，这一预测完全是夸大其词。这种想法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以过去的标准来分析现在的趋势，它的提出还由于在面对重大且迅速的战略演变时，难以找到新的分析框架来对现实做出恰当的诊断。此前，在“第三次巴勒斯坦投石运动”爆发之际，在“新慕尼黑协定”镁光灯闪烁之时，人们不是就谈论过“新冷战”吗？这些众所周知的词汇让人用起来得心应手，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容易适应新局势。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准确的词汇，而且，将过时的解读强加在已经足够危险的局势上面，本身就是危险的事情。没有必要再以错误的判断来加剧局势的恶化。

在全球化（或者说信息空前传播）的世界里，虽然冲突增多了，但是其范围却不是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如果在地球表面的很大一片区域内都发生冲突，某一些冲突之间有明显的联系，而另一些冲突之间也有更为广泛和确凿的联系，但并没有可以将它们整合起来的划分标准。这些冲突所反对的并非是相同的主角。当前，全球范围内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能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类似的对抗联盟体系；也不存在一个极权的、极富攻击性的，具备在全球领土范围内称霸的强国，例如引发“二战”的那些国家。伊斯兰国制造了一些恐怖事件，但是它没有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实力。也不存在一个以将世界阵营一分为二的逻辑为基

础的意识形态划分，在这一划分体系下，所有的冲突都将间接地导向两大超级强国，就像已经被某些人定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时期那样。难道人们忘记了在2001年9月11日后，新保守派所谈论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吗？

两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改变的还有核威慑。俄罗斯既没有意愿，也没有手段去攻击美国。美国知道与莫斯科对抗将付出十分巨大的代价。地区性的冲突可以转嫁到所发生的地区之外，但它不会导致普遍的对抗。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单一且全面的对峙，而是有多种多样的对峙，它们有时相互重叠，有时则互不相干。

显而易见的是，大国并未操控世界局势。以前，人们抱怨那令人窒息的美苏共治；今天，人们却为缺少世界警察或地区警察而感到惋惜。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应该将过去理想化，不应该错误地为造成不公平的冷战而感到遗憾，即使冷战建立在某种秩序之上。冷战时期并不是和平的，有非殖民化战争、越南战争、频繁的军事政变（其中就有造成50万人死亡的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变）。但是和当今发生的冲突一样，冷战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受害者。

让我们成为受害者的，并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而是一个可靠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缺失。不可否认，两极世界结束后，新的世界秩序尚未确立，我们将为之付出代价。 [\[1\]](#)

[\[1\]](#) 作者的言下之意：尽管我们要为世界新秩序的确立付出代价，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译者注

欧洲是政治侏儒吗？

欧洲虽然是经济巨人，却是战略侏儒。在国际舞台上，欧洲不是扮演着“全球玩家”的角色，而是甘愿成为一个“全球玩家”^[1]（就像人们去提款的一个资金窗口）。

欧洲没有美国那样的战略力量，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军事实力。此外，就像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们与反对者们之间的对立，或对于是否承认巴勒斯坦的意见分歧所显示的那样，欧洲还因为一些重要议题而分裂。比起欧盟老成员国来说，欧盟新成员中从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对俄罗斯、难民或伊斯兰教表现出更加不信任的态度。并不是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有野心，也并不是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有国际野心的手段。

在德国统一以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的签订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是，在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现实面前，这一希望破碎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保了安全需要，很多欧洲国家认为，过于疏远美国是徒劳甚至是危险的。有些人说，如果欧洲国家以美元作为货币，那么它们将永远不会使用欧元这一统一货币，这是北约在安全层面发挥作用的体现。但是这并不能在原则上阻碍北约内部的协调与配合。法国未能成功地使其他欧洲国家接受它“欧洲强国”的概念，但局势终究还是变化了。军事实力很重要，但是，军事实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战略问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就是明证。人们注意到目前欧洲存在着一些分歧，而以前更多的是异口同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例如应对气候变暖、援助发展以及抗击流行病，欧洲各国成功地达成了共识。对欧盟机构的改革，为的是创设欧洲理事会的常任主席（任期两年半）和作为共同外界部门负责人欧盟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这使欧盟各国更加协调。在预防地区冲突这一问题上，欧洲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年2月，法国与德国联手，成功地促使各方接受了关于乌克兰和平的计划。^[3]欧洲的软实力不容忽视。它被视为和平力量，代表了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一个政治整体。与其他区域性组织相比，欧盟更具统一性。如今，多边主义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欧盟尤其习惯于采用它。欧洲目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经济增速放缓有关。但是，

欧洲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却占据22%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50%的全球性社会支出，这说明它依旧是很有吸引力的。

[1] 作者在本段话中使用了两次英文词组“global player”，以营造表达的效果。——译者注

[2] 即《欧洲联盟条约》，于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上签订。它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译者注

[3] 即《新明斯克协议》，是2015年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的一系列落实2014年《明斯克协议》的措施。——译者注

德国在主导着欧洲吗？

德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显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因此它正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欧盟国家——它很喜欢这种领导权。德国的欧洲色彩变得更淡了，一个由德国主导的欧洲正在我们眼前呈现。默克尔是欧盟的领袖。

德国有8000万居民（法国只有6600万，位居欧盟第二），其国内生产总值为33560亿美元（法国只有24220亿美元，在欧盟位居第三），约占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30%。德国的失业率是其人口的5%，而欧盟的平均失业率是10%。德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2000亿欧元。德国良好的经济状况使它明显区别于其他欧盟国家。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都和柏林走得很近。

德国极大地领会了重新统一带来的好处。84%的德国人认为：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层面上，德国是主导性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德国工业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的。这些企业经营状况稳定，在外贸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相较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德国工业因内部需求的降低所受到的冲击则相对较小。管理之严格与工业之强大，让德国成为欧盟国家之中的例外。

但是，德国也遇到了居民购买力萎缩的状况。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德国的个人收入不平等程度居第13位。在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德国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它很傲慢，这主要是由于它将严苛的计划强加给了欧洲的南部国家，让这些国家叫苦不迭，甚至还引发了它们的仇德情绪，尤其是在希腊。一些人甚至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极端者甚至将默克尔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此，人们认为德国既自私又自大。可是德国却自认为这是合乎道德的，它还想提醒那些拒绝消灭长期赤字的国家要遵守预算规则和经济规则。此外，德国也从英国脱欧中得到好处。尽管英国一直未能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恢复过来，但是，英国脱欧也将让德国在欧盟核心中少了一位自由派盟友。

法国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法国的经济问题却使自己在与德国的伙伴关系中处于次要位置。德国人不想让自己表现得过于傲慢，他们知道：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形象都越来越差，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低出生率（德国每个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是1.4，法国是2.1）将是未来导致德国衰弱的一个因素。即使接收100万左右的难民对德国有促进作用，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安吉拉·默克尔在难民接收上表现得大度，是因为德国需要他们。但是，德国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单边措施，却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批评。无论如何，德国不具备战略能力的要素，没有军事震慑的能力，也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当然也没有核武器。如果没有法国关键性地介入，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明斯克停火协议是根本不可能达成的。在最近一项帮助希腊的计划中，德国最终决定让步。

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关系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德国的多数负责人都会意识到，德法组合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只有深深植根于欧盟，德国的国力与繁荣才有保障。如果德国过于想要扩大自身的优势，那么它可能遭受惩罚性的反击。

英国脱欧对欧盟是一场灾难吗？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选民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离欧盟。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的衰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也许是其解体的开始。

这是第一次有国家决定离开欧盟。从欧洲经济共同体（CEE）到现在的欧盟，它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成员国从6个增加到了28个。因此，英国脱欧让其他27个成员国感到震惊。然而，英国公投的结果并非宣告了一场灾难，反而将使局势变得更加清晰。英国一直都是欧盟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在欧洲建设的规划布局上，它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英国脱欧后，在欧盟内部，它将不再起到制约作用。英国对欧盟犹豫不决的态度由来已久，在欧洲的建设中，它从来没有起到发动机的作用。

欧洲和欧洲领导人可以抓住这个时机，着手制定欧盟发展的新路线。到目前为止，面对公众的指责，欧盟领导人仍然无动于衷，甚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至于英国同欧洲的关系，欧洲人在面对英国所奉行的苛刻政策时，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疲惫感；而英国人则觉得他们的意见在欧盟内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我们并不怕英国脱欧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它对欧洲的决策机构来说是一个警告。

英国脱欧投票胜利几小时之后，投“离开”票的人就表达了悔意。英国经济的确遇到了巨大的难题。这一切都表明，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并没有掀起让其他欧盟成员国离开欧盟的浪潮，却最终成了欧盟的一个制胜法宝。荒诞的是，英国脱欧反而让归属于欧盟的好处更加明显。虽然英国的政治人物想要拿脱欧来炫耀，但他们还是要为这一决定付出代价——英国将从反面为欧盟成员国证明欧盟的好处。如果欧洲领导人决策得当，那么欧盟最终不仅可以从英国脱欧的影响中走出来，其自身还可以得到巩固和加强。

英国将会因脱欧而被大大削弱，它的国内经济会为脱欧而付出代价，其国家信用也将受到牵连。苏格兰完全可能为了保有在欧盟的席位而希望自身脱离英国。如果苏格兰要脱离英国，这将对英国的尊严、国际地位以及声誉造成极大影响，英国将因此进入战略衰弱期。

此外，英国脱欧后，将会削弱同大西洋彼岸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将

不再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知道，只有英国在欧洲有影响力，只有它能够在欧洲传达美国的意愿，那么它才能和美国成为战略伙伴。由此可见，在着手脱欧的道路上，英国放弃了它中间人的角色，这将会使美国认为英国不再那么有用了，不能继续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服务，况且对美国而言，欧洲大陆的战略意义本身就已经变弱。最终，英国脱欧将会使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今后，欧盟必须表明它能够解决欧洲大陆的诸多难题，而不会将欧洲国家卷入新的、更深的难题中，因为欧洲民众对此持拒绝态度。

法国在国际上已经无足轻重了吗？

法国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怀念之中，它幻想着自己在国际上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实际上，法国却持续走向衰落，它没有能力解决国际难题。

进行不恰当的历史对比，且对当今时代“实力”一词的认识有误——这样的双重错误导致“法国走向衰落”这一论点甚嚣尘上。这样说没有错，毕竟法国已经不再具有路易十四或拿破仑时代的地位。对此，我们或许还应该选择一个具体时期：是奥斯特里茨战役 [\[1\]](#) 之时或滑铁卢战役 [\[2\]](#) 之时？是太阳王 [\[3\]](#) 在位之时还是一个混乱统治结束之时？的确，欧洲大陆曾是世界中心，而法国曾是欧洲第一强国。然而，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色当战役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口损失 [\[5\]](#)、维希政府、奠边府战役 [\[6\]](#)），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夸赞法国。

错误还出在对实力的看法上。这种实力不能被概括为控制他人的权力，或者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即使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如果我们给实力做个分类，我们会看到：在比其他国家高出一头的美国旁边，有六七个到十来个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实力的国家，这些国家有一种使命，那就是它们要在议题的延伸范围甚至是总体的范围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强国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独自做出决定，但它们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决定得以成形。法国是这个数量有限的小团体中的一员。究其原因，客观来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六位，它不仅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欧盟的创立者，还是八国集团

（G8）、二十国集团（G20）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此外，法国还拥有核武器，其领土从欧洲延伸到大洋洲，甚至是加勒比海海域。 [\[7\]](#) 当我们特别关注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时，我们会看到，法国传递的是普世价值观。不可否认，肯定法国的特殊性有时会刺激到其他国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经常这样描述法国：法国想要捍卫的利益已经超出了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法国是一个有能力从全球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国家。

今天，不仅是法国，任何其他国家也都不能断定自己能够独自解决国际问题。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法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至少外界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或为此感到惋惜，或为此高兴不已。确实，其他强国的涌现必然引起法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但是，法国将会更好地传递其特有的信息：它将采取多边行动，将会摆脱某种过去惯有的傲慢态度。至于法国的领导人们，他们应该避免落入自我贬低（法国起不了什么作用，应该放弃任何想要单独行动的意图）或自我颂扬（法国可以主导世界）的双重陷阱。如果法国想保留某种吸引力的话，就应该延续“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路线，以保持其特有的国际政策。

[1] 1805年12月2日，法国军队（73000人）与俄国—奥地利联军（86000人）会战于捷克奥斯特里茨。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法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由英国、俄国和奥地利组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随之瓦解，奥地利皇帝也被迫取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译者注

[2]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指挥的法军（7.4万人）与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汉诺威联军（6.7万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南的滑铁卢展开决战。信心十足的拿破仑指挥失当，法军被打败。复辟百日之后，拿破仑再次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译者注

[3] 法文为Le Roi Soleil，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他1643—1715年在位，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他对外扩张，对内发展文化，使法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文化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译者注

[4] 1870年9月1日，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队（12万人）被毛奇指挥的普鲁士军队（20万人）围困于法国东部小城色当。次日，身在军中的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9月4日，巴黎发生了“不流血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建立了临时政府，但未能阻止普鲁士军队迅速进逼巴黎。1871年1月28日，普法签订《巴黎停战协定》，宣布法国投降。同年5月10日，双方在法兰克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并赔偿50亿法郎，战争宣告结束。普鲁士因此得以完成德国的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的仪式是在凡尔赛举行的。色当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色当惨败”。——译者注

[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40万人死亡或失踪，占法国劳动人口的10%；除了塞尔维亚，这个比例在各交战国中是最高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损失：300万人受伤，其中75万成了残疾人，12.5万人被截肢。作为青壮劳力和潜在人口增殖者的年轻人损失尤其惨重。20—45岁（以1914年的年龄计算）的男子当中，10人当中有‘两个阵亡，一个成了赡养的对象，三个需要一定时期的恢复’（乔治·杜波）。社会的各阶层都受到了打击，但是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所受的损失比其他阶层受创更重。知识分子的损失尤为严重：入伍的小学教师有一半在战争中阵亡，巴黎高师和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死亡率也很高，且不说还包括了贝居伊、阿兰·福尔尼埃和阿波利奈尔。实际情况或许更为严重：从1915年4月起，法国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在‘一战’期间，法国少生了170万人。1920—1921年的人口复苏远不能弥补这一损失。”见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中卷，第1268—1269页。按：贝居伊即Charles Péguy（1873—1914），通常译为“佩吉”，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诗人和作家。——译者注

[6] 1954年3月19日至5月7日，由中国军事顾问团指导的越南军队，在越南北部山区的奠边府，围攻法国军队。在伤亡1.6万人以后，法军投降。奠边府战役的失败使法国被迫结束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译者注

[7] 法国有许多海外行政区，如位于南美洲的海外省法属圭亚那，位于太平洋的海外省留尼旺，位于大洋洲的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译者注

法国对外政策有左右之划分吗？

就像在内政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对于法国应该实施的对外政策，右派与左派的构想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第五共和国体制下，法国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左派和右派的划分。事实上，在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这一划分尚且存在。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一划分已经消失，让位给另一个更本质的区分。

这个划分已经具体表现为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支持者与大西洋主义以及（或者）西方主义拥护者们之间的对立。

前者认为，法国不能被归结为西方国家，它昔日与那些“南方国家”^[1]一道，今日与那些“新兴国家”一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且，充分发挥这种作用也是法国的利益所在。他们相信，只要法国维持独立路线，不去参加僵化的结盟体系，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法国应该与总体利益相协调，赞成多边主义与多极性。

大西洋主义者和其他西方主义者认为，法国首先是通过其政治大家庭的归属来自我定义的；其主要任务是与这个大家庭及其家长紧密团结。法国在安全上所面临的较大威胁（曾经是俄罗斯，现在是伊斯兰主义或其他涌现出来的势力）让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要跟上西方主导者的脚步。

在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阵营消失以后，关于法国对外政策观点的分界线已经被重新划分了。一部分大西洋主义者重组为西方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将会受到这些威胁：俄罗斯的独裁、伊斯兰势力的崛起——西方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与苏联毫无二致。他们中有些人还开始谈论“法西斯主义”，也赞成介入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人应该给“南方国家”的人民带去进步。

西方文明优越论（它更现代、更民主、更开放、更宽容）悄无声息地树立起来了。它是以西方人自我感觉良好之名义（他们有时还声称输出自身的优势是为了使他人受益），或是以强加于他人的方式建立的。这一论调再次激起人们想到那种以心安理得来掩盖强权者欲望的殖民主

义。

法国对外政策中的对峙并不是左派与右派政党之间的对峙，也不是政党中的两大阵营间的对峙，因为共和党（前身是人民运动联盟）和社会党都被这条新的分界线穿过。

[1] 即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大都位于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故被称为“南方国家”。“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译者注

联合国不起作用吗？

联合国对阻止战争起不到任何作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使安全理事会处于瘫痪状态，组成联合国的众多集权国家阻止了提升民主和人权的一切进展。

指责联合国无能，实际上意在让它为世界现状承担责任。这混淆了结果与原因。《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三大主要任务：和平与集体安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确，当我们总结联合国的所作所为时，可以看到它与前述目标存在着反差，它还有许多事情没做，这常常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臃肿无能的官僚机构。但联合国的臃肿是相对来说的，毕竟它的一般预算（除了那些维和任务以外）在两年的周期内仅达到了54亿美元，而它用于维和的支出则多达83亿美元。^[1]

联合国并非导致国际社会现状与分化的全部原因。由于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之间意见的分歧，这个全球性组织常常不能正常运转。但是，为了确保《联合国宪章》所设立的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联盟又不得不在“二战”结束后继续存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与冷战有关的分裂很快就占了上风。否决权的存在变成了保护盟友的手段。但是，把联合国这一体系的失败都归因于否决权的存在，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否决权本身就是相互竞争的强国归属于一个集体体系的前提条件。

冷战结束之际，在伊拉克于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时，集体安全体系第一次得以按照《联合国宪章》运作。安理会给伊拉克下了最后通牒，让它从科威特撤军。伊拉克对最后通牒的藐视，使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预设的期限规定，第一次以合法的方式，授权对其进行一场军事行动。人们从中感觉到了希望，即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2]所赞美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是，强国之间竞争的逻辑很快就重新成为主旋律。尽管如此，断言在安理会中，西方人、俄罗斯人与中国人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之间还是取得过一致的意见，其中包括在伊朗核计划这样的敏感议题上。此外，为了对利比亚人民实行“保

护的责任”，联合国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俄罗斯和中国的弃权，使这一决议得以通过。然而，保护平民的使命后来演变成北约国家与利比亚反对派的并肩作战，这使联合国未来提议的通过变得更为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功，比如在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使柬埔寨恢复法治国家秩序。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所有国家之间，如果没有联合国这条唯一纽带的话，冲突与不平等将会更多。最后，如果要对联合国做个公正的总结，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OMS）、联合国难民署（HC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专门机构所做的工作。

另外，曾经有提议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到10个，以便将新的国际力量关系考虑进去，但这一提议一直遭到阻拦。

[1] 此处作者旨在通过联合国的一般预算与维和预算的数目来说明联合国并未为其自身的臃肿而付出过高的代价，其用于维和的预算远超过其一般预算。——译者注

[2] 即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2018），美国第51届第41任总统，任期自1989年1月20日至1993年1月20日。由于美国历史上存在过两位布什总统，因此又常被称为老布什，以便与其同样担任过美国总统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作区分。——译者注

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西方世界处于主导地位却又逐渐衰退，伊斯兰世界处于被主导地位却在持续扩张，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价值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包括其间的“9·11”恐袭，可以说，世界局势每天都在向我们表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二 十多年来，“文明的冲突”这一论点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1] 于1993年提出的。在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之后，人们广泛地提及、评论和质疑该论点。在亨廷顿看来，战争的性质一直在改变。从前，战争让君主们与诸侯们相互敌对。法国大革命以后，战争成了国家之间全民参与的事情。在20世纪，意识形态（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冲突的根源。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战争体现为不同文化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亨廷顿特别提到了处于被主导地位却在持续扩张的伊斯兰世界与处于主导地位却节节败退的西方世界之间的斗争。他补充说：伊斯兰的边缘地带是血腥的。因为与其他文明相比，伊斯兰文明更多地将冲突用作政治手段，而且其所参与的冲突也更为暴力。

然而，人们很难看到伊斯兰教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古拉格 ^[2] 的责任。亨廷顿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来支持自己的论证，但这场战争却是这番景象：众多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国民是穆斯林）参与了美国（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对伊拉克（大部分国民也是穆斯林）的战争。尽管如此，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东的冲突仅被视为地区冲突之一，但这一冲突在今后却处于战略中心地位。

文明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但是，亨廷顿却错误地认为历史已经写成，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种文明必将发生战争。没有什么是一自然而然的，一切都将取决于国家领导人与民众的政治决策。穆斯林与西方人可以和平共处，但是，一系列负面的政治决策也可能会激化冲突。有人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明之战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有人认为这两种文明之间的战争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恐怖主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诸多的军事

干涉都使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敌意加深了。

[1]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他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长达58年，曾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他先后在美国政府多个部门任职或充当顾问，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1993年，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以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和激烈的争论。——译者注

[2] 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译者注

冷战死灰复燃了吗？

当俄罗斯与美国在某个战略性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之时（例如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人们就会提到冷战的重现。事实上，就像在“昔日好时光”时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正面对抗那样，双方都加强了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冷战死灰复燃，了而”是——将这过一去论人断并对非这来一自问对题战的看法直接复制了过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确实经常发生较量实力的事情（斯诺登事件、叙利亚冲突、伊朗核问题、乌克兰危机），但这不足以让冷战死灰复燃。因为世界不再是两极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概括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冲突。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既不是站在俄罗斯或美国一边的盟友，也不是悄不作声的消极观望者。今日的俄罗斯已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时那样衰弱，以铁腕主导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让世界听得到俄罗斯的声音，并与华盛顿展开对抗。但是，普京不再是能够控制半个欧洲，且在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拥有基地与盟友的世界性同盟之首领；世界上也不再谋求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夺取对方地盘、希望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意识形态体系。此外，如今的我们处在以国家利益为考量的国与国竞争的情形之中，这种竞争使各国产生深刻分歧，让它们之间摩擦不断、相互对抗。尽管如此，如今的我们并不是处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两极世界形态中，而是处在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如今，不再有这样可怕的情况：紧张局势逐渐升级，最终爆发普遍的核武器对抗。

另外，言说冷战，其实凸显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而事实上，在那些新兴国家里，人们并不谈论冷战。正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人曾一度以为没有什么可以与自己的势力相抗衡了。但随后世界上便涌现出了许多能与西方世界抗衡的国家，这些国家打破了西方世界的稳定优势。具有冷战眼光的，更多的是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西方专家们，他们将普京与斯大林、俄罗斯与苏联混为一谈，因而推进了构建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这让我们想起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弹道导弹的争论和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也正是他们的这种混淆，推动北约不断扩张——尽管在德国统一时，北约对戈尔巴乔夫承诺它将不会扩张。

普京必然会尝试与某些新近崛起、但因历史原因而在对外军事干涉上有所保留的国家达成战略联盟，尤其是当这些对外军事干涉是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而做出之时，或是由美国主导之时。确实，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在美国正面交锋。但是，我们并非处在不同阵营之间对抗或冷战的逻辑中，而是处于国与国之间多形式竞争的逻辑中。

唯有强有力的政权才能统治俄罗斯吗？

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民主政体。从沙皇政体到共产体系，只有那些强有力的政权才适宜领导一个完全消极却渴求秩序的国家的民众。

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列宁及斯大林都是铁腕领导人。在较为自由化的沙皇统治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统治之下，俄国的政权显得较为温和，但是俄罗斯或苏联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2000—2008年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普京，在2012年再次成为总统，其间他曾担任总理。^[1]尽管他恢复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但是，在俄罗斯的内政方面，却让强权复现。这对公众自由造成了诸多限制，但他还是在俄罗斯舆论中拥有很高的人气。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根本就不适合民主政体？只有一个铁腕政权才能在俄罗斯国内外赢得尊重吗？

或许，我们可以先用地理因素来解释这种境况：俄罗斯面积实在太大了，所以它难以实行民主政体。其次，我们可以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来解释——俄罗斯从未实行过民主政体。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文化因素入手：“斯拉夫性格”要求建立一种强势的政权。地理因素很快就被排除，因为绝大部分的俄罗斯人住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况且，其他的大陆国家，例如印度、美国以及加拿大，都可以证明巨大的国土面积与民主政体兼容。一些俄罗斯人确实怀念苏联尤其是它的强盛时期。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民主政体才刚进来不久，难以稳固其根基。而且，在俄罗斯实施民主政体的基础是：它在国际上遭遇的屈辱、国内经济与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以及安全性的缺失。人们强烈感到了这些负面情况的存在，这也解释了俄罗斯民众为何对民主政体失去了好感，因为人们认为民主的建立将会摧毁苏联时期的那些成就。牢固树立民主政体常常需要得到中产阶级的肯定，因为他们是民主政体的重要根基。在俄罗斯，中产阶级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俄罗斯现行政权的不满正是来自这个阶层。但是，如果下结论说俄罗斯不适合民主政体，那就是忘记了这一事实：在欧洲其他社会里，民主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

年的时间才牢固树立起来。而且，在走向民主政体的过程中，这些国家还经历了众多专制政治的“插曲”以及多次倒退。法国作为人权与公民权之祖 [\[2\]](#)，1789年至今，也经历了好几个专制时期，其中有两个帝国、一次复辟以及维希政权。 [\[3\]](#)

普京重返总统之位被视为俄罗斯不能自我民主化的又一个标志，但俄罗斯市民社会还是得到了发展。尽管普京奉行强权，但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以及外部的威胁，使普京得以凭借民众的爱国之心而更受欢迎。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俄罗斯国民的声音也终将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听到。

[\[1\]](#) 2008年5月7日，俄罗斯新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宣誓就职后，提名普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2012年3月，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5月就职，任期至2018年。2018年3月，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译者注

[\[2\]](#) 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同年10月5日得到国王路易十六批准。在世界范围内，这是第一部保护人权的国家法律，影响极为深远。——译者注

[\[3\]](#) 这里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的法兰西帝国（史称“第一帝国”，1804年6月18日—1814年4月14日）及其百日复辟（1815年3月20日—6月22日）、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建立的法兰西帝国（史称“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1870年9月4日），以及菲利普·贝当以维希为首都的“法兰西国家”（1940年7月11日—1944年8月20日）。——译者注

非洲实行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吗？

缺少稳定的国家结构、无法弥合的民族分裂导致了严重的对立、贪腐肆虐、经济和政治落后——非洲已不再能奢望民主。

这一个断言将非洲特定时期的局势和民主根本、永恒的特性混为一谈。如果说在非洲确实仍然存在着非民主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注定要遭受强权或独裁者的统治。这一本质主义 [\[1\]](#) 性质的断言目的在于维护现有政权的稳定，而它并不看好民主的开放，它认为后者是危险的。尽管民主的过渡有时确实会经历不稳定时期，但维持独裁从来不会保证长治久安，因为一个独裁领导人会被另一个推翻。另外，如果说这一断言没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它就有俯就的意味：对一些人（经济和其他领域都发达的国家的人们）来说可能是好的东西，对非洲人来说可能不好，因为非洲太不成熟，难以体验民主的喜悦。东欧剧变后，民主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土地，这在此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此时，人们就再次提出非洲民主化这一尖锐的问题。但是，非洲没有与东欧相同的历史。非洲国家的独立是近期的事情（大部分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这些在去殖民化中诞生的年轻国家，很快就屈服于东西方的对抗之中。在自己国家鼓吹民主的西方人，当得知非洲的那些独裁政权声称反对苏联之时，就非常乐意接受它们并与之打交道。20世纪90年代，由于放松管制、原材料价格下降、世界金融机构对非洲实行了严格的预算政策，非洲经历了经济混乱。这些情况导致非洲社会和政治局势动荡。时至今日，为占有非洲的众多财富（石油、稀有金属、宝石等）而引发的斗争，在非洲国家内部和许多非洲国家之间都屡见不鲜。财富之争吸引了一些非洲以外国家（例如法国、美国、日本和巴西）的参与，这使情况更加复杂。

另外，西方国家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迄今为止，在非洲，像塞内加尔、加纳、博茨瓦纳、贝宁、纳米比亚等，都尊重基本的自由，是彻底的民主国家。2015年3月，尼日利亚经历了自由、透明的选举，穆罕默杜·布哈里 [\[2\]](#) 得以执政。此外，有超过15个非洲国家也可以这样快速地经历民主过渡。至于南非，它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从冷酷的种族隔离制度过渡到民主政体。即使南非经历了严重的腐败，但它还是

成为族群之间政治和解的典范。1960—1991年，除了1982年的毛里求斯以外，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任期是和平结束的。自1991年以来，超过30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在选举后失去了权力。在布基纳法索 [3]，民众起而反抗 [4] 想要违反宪法以保持权力的布莱斯·孔波雷 [5]，其2015年的军事政变也惨遭失败。 [6] 在整个非洲，市民社会都在不同程度地发展着，公民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加畅通，绝对权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e)，又译为精粹主义，是一种认为任何的实体（如一只动物、一群人、一个物理对象、一个观念）都有一些必须具备的本质的观点。——译者注

[2] 穆罕默杜·布哈里 (Muhammadu Buhari, 1942—)，尼日利亚政治人物及退役陆军少将。1983年，他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尼日利亚最高领袖。1985年，他因政变而下台。2015年，他再度担任尼日利亚总统并于2019年成功连任。——译者注

[3] 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西非内陆国家，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译者注

[4] 2014年10月30日，已经执政27年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准备通过议会修宪来延长其任期，这一计划引发了该国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示威者要求他下台。——译者注

[5] 布莱斯·孔波雷 (Blaise Compaoré, 1951—)，布基纳法索的军事强人，曾任布基纳法索总统，于2014年10月31日辞职。——译者注

[6] 2015年9月16日，支持被罢黜前总统布莱斯·孔波雷的士兵们冲入该国的内阁会议，逮捕了临时总统米歇尔·卡凡多 (Michel Kafando) 和总理亚科巴·伊萨克·齐达 (Yacouba Isaac Zida)，以及其他部会首长。随后，在9月18日，他们又发表声明说，已释放被总统卫队扣押的过渡总统米歇尔·卡凡多和两位部长。——译者注

非洲是全球化的失落大陆吗？

被无休止的内战撕裂，被贪腐问题慢慢消耗，被艾滋病蹂躏……谈及非洲，我们只能用这些悲惨的词。与亚洲相反，非洲在经济上未能腾飞。独立以来，非洲国家采用的所有政治模式（如社会主义模式、西方模式）都失败了。

在 21 世纪初期，造成非洲悲观主义论调的原因有很多。当时，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2%，但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1%，贸易额也只占全球贸易额的 2%。2006 年，全球 70% 因感染艾滋病死亡的病例，以及 2/3 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集中在非洲。冷战时期，非洲曾是东西方博弈的焦点，但反常的是，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它带来更大的利益。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超级大国还企图控制非洲。然而，到了 90 年代，人们察觉到情况更加糟糕：非洲被遗弃了。

事实上，21 世纪以来，非洲乐观主义取代了非洲悲观主义。非洲经济经历了一次整体增长，可以被视为“发展的后备库”。很多非洲国家受益于民主体制的建立，后者因政权轮替而得以增强（如加纳、塞内加尔、博茨瓦纳等）。在很多非洲国家，从前的选举是不存在竞争的；如今，选举却真正成为确定领导人的方式。这可能会引发紧张和危机（例如在马里、科特迪瓦和肯尼亚就已经局势紧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洲再次成为很多大国的兴趣点。这些大国中，不仅有从前的殖民大国（其中就包括法国），还有美国（虽然它是出于石油因素和反恐的考虑）。中国和日本在非洲也很活跃，印度和巴西也是如此。全球化的各种博弈（原料、对抗流行病、大规模移民和环境保护）让这些富有国家和新兴国家再次发现了非洲的价值，非洲再次成为焦点。尽管非洲大陆有一些濒临破产的国家（如索马里、津巴布韦、刚果民主共和国），但是，20 世纪初以来，在原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非洲经济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虽然非洲缺少固定电话，但是它却凭借超过六亿的手机用户直接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非洲的市民社会和舆论运动也在不断发展。

当然，非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必须要应对来自年轻人口（教育、健康和就业）的挑战，还要应对如何良好治理以及怎样建立更稳固的国家结构的挑战。目前，非洲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极为不均衡，所以

它还要努力让经济增长更加“内化”。

伊拉克战争是因石油而爆发的吗？

美国为了将其盟国拖入对伊拉克的战争而提出了许多理由。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些理由既不符合实情（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又产生了相反结果（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更是难以实现的（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美国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它一直奉行一种“石油外交政策”。在得克萨斯人乔治·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这一点变得更加确定。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国，它一直十分关注自身的石油供应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外部石油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伊拉克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怀疑其与沙特阿拉伯的盟友关系是否依然可靠（沙特的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0%）。1945年，罗斯福总统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昆西协议》（协议是在“昆西号”战舰上签订的），美国保证维护沙特阿拉伯的政体稳定，以换取后者充足而廉价的石油供应。随后，双方严格遵守了这份协议。一直以来，沙特阿拉伯都答应增加石油产量，然而这样做有时会以降低石油价格为代价，这就会触碰到它保证自身最低限度的经济利益这一底线。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时（或者是由于沙特政权疏远华盛顿，以减少来自仇美势力的压力，或者是由于沙特政权在未来有被推翻的可能），它在伊拉克找到了替代品。人们注意到，美军进入巴格达后，只保护了一栋建筑——伊拉克石油部大楼，却对公立医院和藏有无价之宝的巴格达博物馆弃之不顾，任人洗劫。此外，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对石油事务表现出来的个人兴趣也是众所周知的，包括乔治·布什在内的布什家族在石油上发财致富，迪克·切尼 [\[1\]](#) 曾担任哈里伯顿公司 [\[2\]](#) 董事长兼CEO，詹姆斯·多莉扎·赖斯 [\[3\]](#) 曾是雪佛龙公司 [\[4\]](#) 董事会成员。然而，即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能完全与获取伊拉克的石油摆脱关系，但这并不是它最主要的动机。如果仅以石油利益来衡量，那么，重新与萨达姆·侯赛因开展合作并建立新型关系，将会更加简单有效。萨达姆可能十分愿意给美国提供它所需要的石油，要多少给多少，以换取美国取消使伊拉克遭受了沉重打击的制裁和禁运。时至今日，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仍然低于其战前水平。正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美国人不与萨达姆·侯赛因握手言和。对美国来说，它很难接受在中东地区的中心出现一个强大的伊

拉克；更何况，他们几乎不能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页岩气的开采将重新赋予美国以能源自主权。然而，如果美国想要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它就不能抛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阿拉伯—波斯湾 [\[5\]](#)。因为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都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 迪克·切尼（Dick Cheney，1941—），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任内的副总统。——译者注

[\[2\]](#) 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 Company）是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之一，在超过80个国家有业务经营。它在全球拥有数百个子公司、分支机构、品牌和部门，员工约10万人。——译者注

[\[3\]](#) 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1954—），在2005年1月26日至2009年1月20日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4\]](#) 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是世界最大的全球能源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拉蒙市（San Ramon）并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有业务。其业务范围渗透石油及天然气工业的各个方面：探测、生产、提炼、营销、运输、石化、发电等。——译者注

[\[5\]](#) 阿拉伯—波斯湾（le golfe arabo-persique）即印度洋阿拉伯海西北海湾。它位于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之间，简称海湾。长期以来，关于对海湾的叫法一直存在争议：伊朗称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则称为“阿拉伯湾”。——译者注

核扩散将世界置于危险境地吗？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数量上失控且快速增加的危险，就是被人们称为“核扩散”的现象。

20 世纪核扩散：年所代谓，“专横家向们的区”分核了扩两散种指类的型是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数量上的增加；所谓“纵向的”核扩散指的是在一个已经拥有这类核武器的国家武器库之中，核武器数量的增加。签订于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包括这样的内容：拥核国家真诚协商，出台一个核裁军条约，以完全消除核武器的存在；相应的，无核国家放弃获得核武器的努力。简言之，如果想要遏制横向核扩散，那么就要先放弃纵向核扩散。

今天，当人们谈论核扩散时，考虑的只是横向核扩散。而且，“扩散”一词并不完全适用于实际情况，因为“扩散”意味着一种现象快速且失控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预言，20年之后，世界上将会有30多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即使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其增加的速度还谈不上是一种扩散。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有两个拥核国家（美国和苏联）；50年代，增加了一个（英国）；60年代，增加了两个（法国和中国）；随后，直至20世纪末，只增加了三个（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印度）。虽然朝鲜也声称自己拥有了核武器，不过，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都在与朝鲜进行着无序的谈判，以讨论解除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伊朗曾被怀疑想要获得核武器，直到2015年7月14日，才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协议》。该协议保证在国际监察体系之下，伊朗将不可能把它的民用核计划转变为军事目的。因此，即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但却增长缓慢，我们不能称其为核扩散。

事实上，不扩散核武器政策建立在一个矛盾之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威慑他国的名义为自己辩解，但是，它们却认为只有企图拥有核武器的那些国家才可能会将国际安全置于险境。如果跳出这一认知矛盾，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拥有核武器国家在数量上的增长大大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上述局势被西方世界视为对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为这是对西方优势的挑战。另外，除了核扩散国家的直接邻国，这种新情况并没有被普遍视为重大风险。那些核扩散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是不是造成不安感的附加因素呢？对于民主强国中理性的领导人来说，核威慑不是好事吗？如此疑问忘记了一个事实：根据西方人对“理性”一词的定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肯定不是由理性引导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个政权将“恐怖平衡”融入其战略中；这也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唯一一个真正使用过核武器打击另一个国家的，是美国这一民主国家，它在1945年8月两次使用核武器打击日本（即使在这一时期，使用核武器威慑他国的观念确实还不存在）。此外，那些独裁政权或者质疑世界秩序的政权（比如朝鲜政权）不仅会使其民众难以忍受，也会让其邻国感到惶恐不安。然而，拥有核武器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使用它。朝鲜领导人认为，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和穆阿迈尔·卡扎菲 [\[1\]](#) 拥有核武器，那么，他们的政权将不会遭遇外部军事力量入侵以致最终被颠覆。独裁和专制政权的首要使命并非自寻死路，而是维持其权力。对于这些政权来说，获取核武器不完全意味着它们有侵犯邻国的想法，而可能只是它们保障自身政权稳定不被他国颠覆的一个手段而已。至于朝鲜这一特例，事实上，它只关心如何使其政权免受侵犯，而不关心要向韩国发动注定失败的战争。

[\[1\]](#) 穆阿迈尔·卡扎菲（Mouammar Kadha, 1942—2011），逊尼派穆斯林，利比亚革命警卫队上校，利比亚绿色革命的精神领袖，前任利比亚实际最高领导者、独裁者。对利比亚长达42年的统治使他成为阿拉伯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者。——译者注

恐怖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威胁吗？

人们每天都会提及恐怖主义的威胁。政治领导人和专家们在新闻报道中经常提起恐怖主义，好像这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最大的隐患。恐怖主义的威胁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呈现，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与传统战争相反，恐怖主义确实可以通过其每天的活动来打击我们每一个人：交通、工作、购物和娱乐。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得过恐怖主义的袭击：2015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对《查理周刊》和一个犹太人超市的恐怖袭击就让我们悲剧性地想起恐怖主义的这一特性。如果连作为美国经济实力象征的世界贸易中心都能被摧毁，那就说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是绝对有效的。恐怖分子有这样的优势：机动性强，可以随意选择袭击的地点、时间和目标。而且，即使他们之前十多次都未能得手，只要成功实施一次就可以让人们记住他们。另外，无论是谁，似乎都可以完成一次恐怖袭击，因为这并不需要非常昂贵的费用和特别尖端的技术（人们甚至在互联网上就可以获得手工制作炸弹的方法）。这就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危险时刻都存在着。但是，除了这种惊人的特征以外，恐怖袭击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通常要远远小于传统的武装对抗和针对平民的轰炸行动。对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之所以会对人们的精神造成巨大的冲击，不仅是因为这些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发生在美国本土，更因为它们造成了大量遇难者（将近3000人丧生，这甚至让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们都感到吃惊），而且这些恐怖袭击是在全世界数百万电视观众的目击中发生的。人们对受害者们表达了普遍的同情，“我们都是美国人”——一次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就是以此作为其头版标题的。因此，恐怖主义的影响及它的“成功”首先是心理方面的。

今天，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主要位于伊斯兰世界，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五个国家。

1962年，雷蒙·阿隆 [\[1\]](#) 写道：“如果一个暴力行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超过了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它就被称为恐怖主义行为。”这个论断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

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们的确不应该否认它的存在，但是，

高估它的存在同样也是危险的。那些工业大国现在如此痛苦地遭受着恐怖主义的折磨，是因为它们数十年来都自认为处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此外，还因为恐怖主义带来的不对等战争对这些工业强国里较弱的国家产生了威胁，而它们的传统武器装备却无法予以应对。因此，消灭使全球不安的危险（尤其是消灭恐怖主义的威胁）似乎是一种幻想。在地缘政治中，零风险是不存在的。随着伊斯兰国（达伊沙）的建立，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了立足之地。尽管如此，对西方世界来说，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昔日的苏联威胁相比，还是不在同一个水平之上。

[1]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20世纪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他是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的同学。在大学期间，他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1930—1933年，他在德国任教和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斯·韦伯、西美尔、曼海姆、胡塞尔和舒茨等人的著作。在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他承认马克思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但认为其观点是不可接受的。1935年，阿隆撰写了《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一书，将德国社会学名家介绍给法国学术界，其中一半的篇幅是介绍马克斯·韦伯。1938年，阿隆在索邦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应征入伍。在法国失败以后，他流亡到伦敦，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抗战运动”，并主编《自由法国》杂志。1955年，阿隆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严厉批判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思想僵化，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阿隆还对极权主义展开批判，认为苏联是一个“极权国家”。他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认为那是自由民主的障碍。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阿隆与支持学生运动的萨特针锋相对，明确反对学生造反。在当时的造反学生中，流行着一句话：“宁随萨特走错路，不随阿隆行正道。”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法国知识界左倾思想的退潮，越来越多的人将阿隆视为法国学术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权威。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阿隆对一些政治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在发布阿隆去世消息的时候，法国《解放报》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译者注

我们在与恐怖主义作战吗？

新保守派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而发动战争，其中，乔治·布什就以此来为其200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干涉辩护。

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斗手段，但很难说我们在与它“作战”。相反，我们可以考虑对达伊沙和基地组织这两个恐怖组织发动一场战争，而前者正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毫无疑问，这两个恐怖组织希望损害甚至毁灭西方国家的安全。它们已经在西方国家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受害者。

然而，如果把我们与恐怖组织之间的对抗说成是战争，就等于赋予恐怖分子以他们力图得到的地位。恐怖分子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行动尚未结束，这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但更公正地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将他们视为罪犯。某些评论家或政治组织负责人将这种状态说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类观点是将恐怖主义组织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然而，虽然恐怖分子渴望摧毁我们的社会，但他们的组织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是过于看重他们，以至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过度地限制公共自由。此外，还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将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混为一谈，让穆斯林集体对伊斯兰圣战分子的恐怖袭击负责，并挑唆西方民众去反对穆斯林。这正是达伊沙所寻求的：在穆斯林和其他人之间制造一条鸿沟。

对西方人来说，就像他们和其他风险共存一样（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其中一些还会造成更多人死亡），他们也必须学会与恐怖主义的风险一起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将恐怖主义置于我们日程的中心，这可能会在恫吓胆小者的同时，使恐怖组织更为方便地招募人手和筹集资金。

2016年1月，奥巴马发表了其任内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他批驳了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打击伊斯兰国的观点：“成群的武装分子登上皮卡车，灵魂扭曲的人在公寓或车库里策划着阴谋。这些确实都对平民构成了巨大威胁。但是，并不像达伊沙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存在’。”

恐怖袭击在欧洲、美国、非洲和中东等多地发生——如果考虑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有全球化的表现。但是，视其为世界大战则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会妨碍人们对恐怖主义现象的真正理解。

从2015年1月1日到2016年7月31日，在欧洲和美国发生了48次恐怖袭击，造成了658人死亡。同一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2063次恐怖袭击，造成了28031人死亡！

2002—2012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1]共统计到104000次恐怖袭击，其中，35%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都曾经是西方国家军事干涉的目标。

[1]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依据世界各国恐怖活动的程度来排名。该指数结合了许多影响超过10年时间的恐怖主义行动，借由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的一系列数据来加以分析，之后建立指数地图显出国家恐怖主义之趋势。——译者注

理解恐怖主义就是为其辩护吗？

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因此，试图去理解它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理解它就会给恐怖分子的行为赋予合法性，也会导致以一种托辞文化来减少他们的责任。而托辞文化的目标和效果，就是为无法辩解的行为进行辩解。

理解一个现象不等于赞同它，解释一个现象并不是为它辩护。相反，人们可以这样来想：为了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应该拆解它，明白它的运行机制和原动力，以便消除滋养它的土壤。比如，尝试理解癌症的机制不等于接受它，而是要我们用最好的手段来对抗这个祸患。对待恐怖主义，我们应该毫不妥协；同样，对待产生恐怖主义的那些原因，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抨击恐怖主义的结果而不考虑它产生的根源，这会阻碍我们与它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避免对恐怖主义进行辩护而自我设限，禁止人们去理解它，这其实是将我们拖入了一个死胡同中，因为这意味着我们采用了一个纯粹武力的解决方案，这必然是片面的。如果某些族群或宗教团体出于本性必定会走向恐怖主义式的暴力，而且，如果他们诉诸恐怖主义手段并不是特殊历史形势的产物，那么，我们对其进行严厉的军事回击将是正当、有效的。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均表明，恐怖主义孵化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之中，完全的军事打击并未有力地回击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伊拉克自由行动”（Iraqi Freedom）的官方目标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布什当局指责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然而，结果却是相反的，恐怖袭击在伊拉克成倍地增加，该国还吸引了一些国际恐怖组织，而这些组织之后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达伊沙就是受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间接影响而建立的。此外，2006年9月，美国情报部门甚至承认，伊拉克战争加深了恐怖分子对美国的仇恨。实际上，对恐怖主义所采取的纯粹军事打击滋生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

因此，那些建议不要反思恐怖主义产生原因的观点，将导致我们与恐怖主义的抗争进入一个没有结局的僵局中：军事打击恐怖主义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提供了养料，还将牺牲夹在交火双方中间的一部分平民。最后，对于那些认为恐怖主义产生巨大威胁，却建议人们不要反思威胁产生原因的人，人们真该问一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气候变暖将因技术进步而得以避免吗？

国际上关于自然环境的法律约束（比如《京都议定书》所包含的内容）对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是徒劳的。技术进步将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气体的排放。因此，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对我们构成威胁，那么，技术进步将带来解决办法。

上述态度背离了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国际意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地球高峰论坛上，那些最富裕的国家决定，将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的水平。对它们来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似乎是可以承受的；事实上，这些国家也是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以强制性的法律形式将这一愿景量化到实践中。当时，美国承诺把排放量减少7%，^[1]日本承诺减少6%，欧盟承诺减少8%。然而，到了2001年，作为人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美国决定不批准该协定。在2007年的G8峰会上，与会各国考虑在2050年前减排50%的温室气体。但是，应美国、中国和日本的要求，这次峰会并未达成促成这一目标实现的强制性措施。

为什么美国会拒绝量化地减少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关于这一议题，在比尔·克林顿还是美国总统之时就要求坚持不同的立场，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减排措施将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此外，小布什总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作用没有经过科学的证实。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符合美国在面对来自外部秩序的约束时一贯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态度，也符合美国对自身技术优越性的信心：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总是能解决问题，甚至包括政治秩序问题。持这种倾向的思想认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是市场，而不是规章，市场的力量和持续增长的经济将足以推动未来的人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与气候变暖现象抗衡。然而，这种想法低估了气候变暖这一问题的广度，它已经造成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在能够发展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尚不能发展这些技术的国家之间造成不平等。这种观点同样忽视了对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要通过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而且，只有国家才拥有采取这些行动所必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为这涉及规章制度（颁布二氧化碳的排放份额）、强制性规范、征收税费（污染者自付费原

则、对碳排放征税）、发放补贴（在前途无量的技术具备竞争力之前，就给予财政支持或制度保障），甚至涉及研究方向。国家的作用以及对国家具有强制约束的国际规章的作用，对实现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都是至关重要的。

2014年，中国和美国承诺在未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两个国家意识到气候变暖可能对它们的经济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召开（COP21），与会各国第一次表示要共同采取强制措施。195个国家如此承诺 [\[2\]](#)：到2050年，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之内。一些人认为《巴黎协定》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尽管它的内容不是一个普遍的目标，至少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1\]](#) 这是与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下同。——译者注

[\[2\]](#) 值得注意的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达成后并非立即生效。因为据相关规定，该协定将在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55%）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成为了第23个完成批准协定的缔约方。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译者注

特朗普会让美国再度强大吗？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采用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强大”。这显示了他想要重新赋予美国以经济活力、战略活力的雄心。

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在其两个总统任期内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他指出，美国在众多外交事件中都退却了，他因此悲叹奥巴马在面对一些敌对性强国或竞争性强国时，没有表现出坚决的态度。在他看来，美国能够且必须重新领导世界，不必因为对多边机制和国际义务的尊重而损害自身利益。

如果说特朗普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于奥巴马，二者却都基于一个相似的事实认定：美国不再独自决定国际议程，也不再领导世界了。然而，奥巴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必须更多地走向多边主义；相反，特朗普考虑的是回到大刀阔斧、不受约束的单边主义。问题在于，这不单单是一个意愿问题。无论特朗普愿意与否，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实力方面的独大地位，已经过去了。在实际行动中，如果预设它还存在，将是不现实甚至是危险的。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反对束缚了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多边主义。他让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了关于气候的《巴黎协定》和关于伊朗核能利用的协议（并禁止其他国家与德黑兰继续保持商业往来）。对于像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行动，他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特朗普还指责欧洲和中国从对美贸易中所取得的顺差，希望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关税，威胁要对北京发起一场他自认为“美国必胜”的贸易战。

特朗普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并优先考虑从美国购买武器。在两年之内，他把美国的军费从6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00亿美元。在特朗普的世界中，不存在什么盟友，只存在乖乖屈服于美国领导的仆从。他的要求在短期内会给他带来某些满足，因为很少有国家想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然而，这最终会引起有损于美国的反应，比如让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遭到质疑。

如果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话，那已经是特朗普当选之前的情况了。由于税收减少和军费的增加，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极速增长。

特朗普是不理性的吗？

冲动地发布推特文章，毫不犹豫地辱骂其认定的竞争对手、记者甚至是外国元首们，行为冲动，言辞粗鲁无礼。——特朗普让人难以应付，他完全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人。

特朗普的言行举止确实异于历任美国总统，尽管他的前任们的政治归属和个人风貌不尽相同。特朗普完全无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不管他们属于美国的盟国与否。美国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在其新作中，把特朗普描绘成抓不住总统职任之主要目标的人。^[1]在他的执政团队中，甚至有一位高级官员在《纽约时报》的论坛里，（匿名）指责特朗普的“非道德性”。^[2]

特朗普总是冲动地做出决定，根本不管他的决策会给已经脆弱的世界现状造成什么后果。他让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废止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协议，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质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威胁说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又发动了与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战。这些决定都波及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让它们担心现有的国际体系会被动摇，自己将被抛入全球治理的大范围危机之中。

然而，在特朗普草率和浮躁的风格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宏大的逻辑。

实际上，从特朗普自身的角度来看，他的对外政策还是相当连贯的。另外，这种政策首先是，且几乎只是为了满足他的选民。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会受制于内政，特朗普则把这种倾向推到了极致。归根结底，他的那些决定都是为了满足和奉承他的选民——他期待后者能在2020年将其再次送入白宫。这些人，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们，都极其支持以色列。他们认为，“全世界都靠美国的施舍而活，是时候来结束对那些忘恩负义国家的慷慨大度了”。自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员被劫为人质事件^[3]以来，伊朗就一直为美国所憎恨。因此，特朗普的选民没有考虑《伊朗核问题协议》是否有利于国际安全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像是一个白白浪费钱财的组织”；“全

变暖是中国为了阻碍美国经济的一个阴谋”；“中国人和欧洲人正在通过贸易顺差来掠夺美国”。因此，对于那些坚持这些成见，并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来说，特朗普所采取的措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美国总统加剧了紧张局势，以便供养美国的军工企业。美国与朝鲜的危机使美国可以向犹豫不决的韩国出售昂贵的导弹防御系统，增加日本从美国所购买的武器。海湾地区向美国工业企业下了大量订单，这表明该地区的危险性逐渐上升。特朗普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义务，作为交换，他要求欧洲国家将其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提高至2%，而这也应该会造成美国军售的大规模增加。

——特朗普这个人物有点异想天开，容易被对手们当成笑话。但是，他有明确的目标，并理性地追求着。

[1] 罗伯特·伍德沃德：《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2018年版；法文版由罗伯特·拉封出版社（Robert Laffont）于2018年出版。

[2] I Am Part of the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我是特朗普团队里面的一名抵抗者》），2018年9月5日，《纽约时报》，参见：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05/opinion/trump-white-house-anonymous-resistance.html>.

[3] 即“伊朗人质危机”或“伊朗人质事件”。自1978年1月起，伊朗各地爆发持续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之中。1979年1月中旬，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海外。两周之后，长期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民众的热烈欢迎，立宪君主制度随即彻底垮台。1979年4月1日，在全国公投之后，伊朗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由于美国长期支持巴列维王朝及其世俗化政策，遭到伊斯兰革命狂热支持者的强烈怨恨，伊朗革命者宣布美国为伊朗的头号敌人。1979年10月，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前往美国治疗淋巴瘤，这大大激怒了伊朗革命者。霍梅尼在其公开讲话中，把美国称为“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示威。1979年11月4日，成百上千的伊朗学生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国王以换取人质。这个诉求得到了伊朗政府的支持，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外交危机和内政危机。在外交努力无效的情况下，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决定以武力解救人质，却遭遇了失败，使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大受损害。两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急于摆脱人质危机，以对抗强邻伊拉克。在随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卡特总统未能获得连任，其对人质危机的处理无方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原因。于是，美伊双方展开了秘密谈判，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使美国人质在次日得以释放。——译者注

存在着“流氓国家”吗？

存在着这样一类特殊的国家：在国际层面，它们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它们不尊重本国民众的人权，对其边界之外的和平也构成了威胁。

2017年9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提及朝鲜、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时，特朗普再次使用了“流氓国家”这个概念。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认为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对集体安全和美国利益构成了威胁，因而将其定性为“无法无天”。但是，“流氓国家”（英文：Rogue State）的概念是在1994年，由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来的，以便指称“长期不能与外部世界相协调”的国家，即企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团体、虐待其本国国民或对美国怀有敌意的那些国家。这个表述被“令人忧心的国家”（英文：State of concern）取代了，该词是由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提出——她于1997—2001年担任了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特指那些不尊重国际社会的既定规则，会对国际社会构成危险的国家，认为它们理应受到制裁。乔治·W. 布什上任以后，恢复了“流氓国家”这一名称。

虽然布什政府从未正式确定流氓国家的名单，但是，各种各样的评论使人得以建立一个流氓国家的轮廓。它涉及利比亚、古巴、朝鲜、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这个半官方的认定标准包含下列因素：政权的独裁性质，参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对国际安全的损害。

但是，“流氓国家”的概念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谁来设定其认定标准和制裁措施呢？很显然，只有美国可以决定哪个国家有罪，并为自己保留了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采取制裁的权力。此外，对违法行为的性质也没有做出更多的界定：独裁国家并没有被全部包含在内——远远没有，最恶劣的一些国家都不在“流氓国家”名单之中。同样，某些拥核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也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他们确实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与该条约矛盾）。对国际安全的那些损害，同样可以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实际上，真正被归入“流氓国家”范畴的，是反对美国外交政策

的那些国家。

2002年1月，布什正式宣布了构成“邪恶轴心”的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2005年1月，在参议院国务卿宣誓就职的演说中，康多莉扎·赖斯明确指出，白俄罗斯、古巴、伊朗、缅甸、朝鲜和津巴布韦这六个国家是暴政国家。奥巴马当选后摒弃了这种说法。

因此，“流氓国家”这一说法是在特朗普总统的口中重现的。但是，最好问一下这个问题：与众多的国际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巴黎协定》等）保持距离的美国，在2003年发动了对伊拉克的非法战争，还建立了关塔那摩监狱，是不是确有资格来制定一份“流氓国家”的名单？

穷人越来越多了吗？

贫困远没有被消灭，似乎还加剧了，发展援助注定要失败。根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的统计，世界上有87%的人这样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贫困增加了或维持原状。

贫困实际上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它正在减少。与批评全球化的观点相反，全球化使许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仅在中国一个国家，过去40年来就有7亿人脱贫。

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全球发展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在1990—2015年之间将贫困率减半，这一目标在2010年得以实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设定为每天1.90美元）以下。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19亿。这意味着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减少了十多亿，而同期全球人口则从45亿增长到了72亿。极端贫困率直接降至原来的1/4：三十年前它涉及42%的人口，而2015年则不到10%。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百万）

	1981	1990	2008	2010	2015*
低于 1.25 美元 / 天	1938	1909	1289	1200	736

资料来源：巴斯卡尔·博尼法斯，《理解世界》，阿尔芒·科林出版社 2017 年版。

* 从 2013 年开始，世界银行新定的标准为 1.90 美元 / 天。

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在东亚，目前只有7400万非常贫困的人口（1980年为10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0.5%降至3.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80年，贫困人口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而今天这一比例为40%。

尽管全球化是有效的，但它也是不公平的，在减少贫困的同时，它增加了不平等。事实上，最富有的那1%的人所积累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其余人口财富总和的一半。世界上最贫困的那50%的人只拥有世界财富的1%。在西方世界，信息和通信新技术为少数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中产阶级财富增长几乎停滞，在西方国家甚至还相对下降了。2018年，由托马斯·皮凯蒂领导的一百多名研究人员所撰写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增加。

世界不那么贫穷了，却更不平等了。

“难民危机”存在吗？

大量因逃离战争、独裁政权和贫困的难民涌入欧洲。这场“难民危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导致欧洲国家陷入分裂。

来到欧洲的难民中，有2/3的人来自这五个国家：叙利亚（630万）、阿富汗（260万）、苏丹南部（240万）、缅甸（120万）和索马里（100万）。

鉴于欧洲既有难民的大量涌入，又有为此展开的激烈争论，这种局势对它提出了一个战略挑战，甚至动摇了它的统一。对于生活在欧洲之外的人们来说，欧洲仍然是繁荣与和平的黄金之地，尽管在其内部，可以感受到欧洲民众的厌倦和强烈不满。这也没有阻止欧盟之外的国家接收更多的难民——土耳其（350万）、巴基斯坦（140万）、乌干达（140万）、黎巴嫩与伊朗（100万），在它们领土上的难民人数已超过了像德国（97万）这样的欧洲国家。

欧盟未能恰当地应对难民潮，在如何更好地回应这个问题上，欧盟各国之间分歧很大。我们所目睹的，更多地是一场“接待危机”，而不是真正的“难民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裂痕再次出现。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无法接待欧盟按照配额分给他们的2000名难民。此外，较之于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难民，这些国家更欢迎乌克兰的难民。

如果说许多人赞扬安吉拉·默克尔的慷慨，因为她接受了100万难民到德国，那么，别忘了她这么做是因为接纳这些难民是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的：一方面，可以解决德国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就业。问题在于，默克尔在没有与其他欧洲国家真正协商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她的举措从表面上看是慷慨的，却终究是单边的。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振振有辞地指出：我们不能只向欧盟求助而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法国和其他国家一起，让意大利独自挣扎于难民潮的第一线，甚至关闭了在文蒂米利亚的两国边界，它不够资格去教训别人。

欧盟无力应对难民挑战（这是其陷入僵局的迹象）引发了更为严重

的危机，这表明：“联盟”这一术语并不符合现实。难民问题的挑战所造成的主要后果，是在一些国家（甚至包括像意大利这样的欧盟创始成员国）极右派运动的崛起，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这些问题的议程。难民问题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领域，在其中，冲击性套话胜过了理性的反思，直觉胜过事实本身，蛊惑人心的宣传胜过了专业的评估。然而，我们并不缺乏真正了解这一现象的专家，问题是当局并没有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也许是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想象了。

尽管存在有“难民危机”这一成见，但是，现在寻求加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却在减少。难民潮是在2015年达到峰值的：申请人数超过100万。在2018年，这一数字仅约13万。

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是非政治性的吗？

体育运动不止运动本身这么简单。在竞赛、结果和表演之外，体育运动也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博弈。

每四年举办一次的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是最受媒体关注的两项全球化体育赛事。在经过了激烈的淘汰赛之后，32个国家进入到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足球的最后竞争阶段；所有国家都派遣运动员参加包含多种多样体育项目的奥运会。这些比赛激发了体育迷和观众的热情，使他们为运动员们所取得的成绩而激动不已。电视转播让全世界的人们可以观看到这些比赛。

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是全球最引人注目、最受欢迎的两项赛事。但是，它们不是仅仅关乎体育竞技，它们的战略影响或地缘政治影响越来越明显。在全球化消除国家身份之时，体育竞赛重新定义了它。对国家足球队的支持超越了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对峙，足球队成为国家身份的载体。电视转播的比赛使国民因为支持足球队而更加团结。

在奥运会期间，每个运动员都尽力表现出色，奖牌数量成为国家实力的证明。我们处于一个软实力的时代。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国家间的竞赛延伸到了体育竞技之中，它们各自都力图以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次数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夺冠以及闻名于世、广受人喜爱的体育明星来吸引关注，赢得尊重，获得好感。不管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是刚独立的年轻国家，都通过参与全球体育竞技来展现自己，这甚至比其在联合国的使团更引人注目，也更有利于国家团结。同样，加入国际足联（FIFA）或国际奥委会（CIO）和加入某一其他国际组织一样重要。

比赛主办权也是激烈竞争的目标。尽管举办比赛带来的经济影响相对有限，但追逐的目标在于主办比赛所带来的国家声望，因为这些比赛会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主办国会在这段时间内成为世界的中心。因此，当我们看到2009年10月4个国家的元首与相应的4个城市的市长齐聚国际奥委会，为201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争论不休时，就不会觉得这是个

偶然。东京、马德里、芝加哥和里约热内卢这4个城市几乎势均力敌，除了从专业角度对它们各自所提交的材料进行考量之外，地缘政治因素也十分重要——这正是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被选中的原因所在。国际奥委会想要表明，在把奥运会主办权赋予一个新兴国家时，他们还附加了从历史角度进行的考量，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创造历史而这么做的。就在同一年，G8峰会被G20峰会取代了。^[1]2010年6月，南非举办了足球世界杯。这是在非洲举办的第一次重大国际赛事，而纳尔逊·曼德拉的个人影响成为南非获得主办权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很多评论家都质疑南非举办这项赛事的能力，但是，南非世界杯还是取得了成功。同样，中国通过举办2008年奥运会证明了其作为大国的实力。中国还可能会赢得2030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权。国际足联将2018年足球世界杯举办权赋予了俄罗斯，将2022年的举办权赋予了卡塔尔，这都引起了争论。但是，国际足联正是想通过将赛事主办权赋予从未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来继续拓展足球的影响力。2022年将第一次由一个阿拉伯国家来承办一项重大的全球性体育赛事。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伊斯坦布尔在申请2020年奥运会时惨遭失败——这届奥运会将在东京举办。

^[1] 2009年，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G20已取代G8的主要功能，成为协调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论坛。——译者注

译后记

一

成见是思想的放假，也可以说，成见是似乎有思想的没有思想。判断思想的标准有两个：逻辑与事实。成见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和传播，恰恰就是因为人们逻辑思维能力的缺乏，和对事实的视而不见。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告诫学生们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他的后学则有更细致的发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然而，随着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对许多儒生来说，儒学退化为记问之学。这严重地妨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

明代学者陈宪章（即陈白沙，1428—1500）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我在后面加一句：“无疑，则毫无长进。”

二

学过解析几何的中国人，都知道笛卡儿（Ren éDescartes, 1596—1650）的名字，但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知道他还是现代西方思想的奠基人。在写于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儿说：

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起，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 [\[1\]](#)

三年以后，笛卡儿写在《哲学原理》中的第一条原理就是：“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改写了上面引述的话，作为对这条原理解释：

从前我们既然有一度都是儿童，而且我们在不能完全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时，就已经对感官所见的对象，构成各种判断，因此，就有许多偏见阻碍着我们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稍可疑的事物，在一生中一度加以怀疑，我们就似乎不可能排除这些偏见。 [\[2\]](#)

“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于是，人们就拥有了一大堆“成见”（*idées reçues*）。这些似是而非的思想，使人们误以为自己有理、有理解，对自己的知识状态感到自满，从而妨碍了他们对真知的追求，阻挠了他们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真正认识。

三

19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产阶级在法国崛起。在义务教育制度实施数十年以后，法国识字人口大大增加，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图书、报纸、杂志的发行。许多法国人说话做事都头头是道，好像很有思想的样子。^[3]然而，却有一些人敏锐地看透了人们的无知与自欺。其中，最有名的是互相引为知己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与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1857年，他们分别出版了惊世骇俗的《恶之花》与《包法利夫人》。他们受到同一个检察官的起诉，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而遭到法院审判。然而，他们一同被后世尊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波德莱尔在诗集《恶之花》的开卷之作《致读者》中写道：“愚蠢和错误，还有罪孽和吝啬，占有我们的心，折磨我们的肉身。”他毫不留情地称他的读者为“伪善的读者”，但又无限爱恋地称他们为“我的同类”“我的弟兄”。^[4]

1852年12月17日，在写给女友路易丝·高莱的信中，福楼拜透露了一个萦绕在他心头已久的想法：编一部《成见辞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他希望：人们将会按字母顺序，在该辞典里找到为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的、可亲的人而必须说的话。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谈话的方便，而是要让它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人们的平庸和愚蠢。

晚年的福楼拜更加愤世嫉俗，想要写一部爆炸性作品，即《布瓦尔和佩居榭》，来冲击周围世界的愚昧与丑恶。作为莫逆之交的两个公文抄写员，在研究科学、创办实业失败以后，重新干起老行当。但是，他们不再抄写公文，而是记下自己听到、读到的废话、蠢话，却意识不到这些话是多么的乏味或愚蠢。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福楼拜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被两个主人公占据了：“我变成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1874年8月，福楼拜正式动笔写作这部小说，然而，直到他

去世，小说还是没有完成，可见他的写作是多么艰难。人们在他遗留的文档中，发现了没写出的最后两章的大纲，其中包括一部《成见辞典》。有些人将标题译为《庸见词典》，其实还是根据字面意思来译更好些。

四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每天获得的信息量之大，是三十年前人们在谈论“知识大爆炸”时想都不敢想的。“但海量的信息淹没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思想，唠唠叨叨的聒噪声屏蔽了存在的严酷真相。”^[5]另外，全球化与互联网也使成见传播得更为广泛。在冷战结束了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后，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可怕现实。

1872年，当著名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开始连载发表《八十天环游地球》时，八十天绕地球一圈，还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今天，乘坐飞机，人们可以在一天之内，轻松地实现这一目标。在大洲大洋的地理阻隔因为交通工具的速度而被超越以后，各国、各族人民变成了“地球村”的居民。

然而，由于历史、现实的种种因素，“地球村”似乎被分割为一个一个部落，不断地发生着更为惨烈的种族、国家、文化、宗教冲突，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疫病传播、恐怖主义、运销毒品、走私洗钱等问题，却真实地实现了全球化。一个爆炸性新闻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传遍全球。但是，人们之间的隔膜、误解却不能这么快地得以消除。这就需要许多有良知和理性的学者来尽力帮助人们消除成见和偏见，以理性的态度，在事实的基础上，去理解其他人群和其他国家，以增进彼此的理解，相互包容，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

五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 1956—）是法国著名的国际地缘政治专家。他于1990年创立国际暨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并一直担任所长。该研究所是法国的两大智库之一。2014年，该所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列入全球顶级智库名单，排名第26位。现在，该所已经发展为有招收学生资格与文凭发放资格的高等学院。

作为一个知名的国际地缘政治专家，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始终保持

着清醒的理性精神与深切的人道关切。他追求以学者的超脱态度与中立立场来阐述和分析问题。因此，他的一些观点不仅遭到左派和激进派的反对，也遭到右派和保守派的指责。这正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本书的主旨是破除因为全球化而产生的那些成见。信息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这些成见，反而使其借助现代传媒和互联网而广泛流传，严重妨碍了人们对当代世界的正确理解。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可读性，以影响普通读者，作者采取了举重若轻的写作策略。他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尽量运用清晰的语言予以分析，让人们认识到，那些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不仅没有达到使人理解现实的目的，反而屏蔽了人们认识现实的眼光。这不是一本大部头的专题性、系统性学术研究著作，但却有极强的学术性。

作者选择了在世界上传播最为广泛的一些成见。这些成见充斥于媒体和网络，而媒体与网络加速和扩展了这些成见的不良影响。作者认为：

（1）我们正处于一个日渐复杂和危险、也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世界。我们处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互联网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广泛传播。然而，悖论的是，鱼龙混杂、真假相伴的海量信息，反而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正确理解。

（2）许多人放弃了去理解复杂的当代世界，而把问题抛给高度专门化的专业人员。人们寄希望于专家，希望他们能够给出权威的解释。但是，专家们满口满纸的专业术语，并不总是能保证对局势做出正确的领会。

（3）专业人员常常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由于世界的日益复杂与学科越来越细分的趋势，专业人员常常只面向一个封闭的学术小圈子，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普通人拒之门外，且以此来保留他们的垄断地位。

（4）许多人都无法抵抗将复杂问题极端简化的诱惑。他们把某一现象的解读简化为两个对立的参数（善良与邪恶、朋友与敌人、我们与他者），这被认为是万能的理解方法。这样，世界仅由两部分组成，很容易便可从中选出一个。然而，简单地谈论国际时事并不意味着要极端

简化它们。

（5）国际问题领域充斥着成见，影响了人们的正确理解和判断。成见不仅充满了大众的头脑，也纠缠着地缘政治学的专业人员们，不管他们是政治负责人、外交官、军官、专家、教师、研究人员或记者。

（6）如果一些人蓄意散布成见，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成见与他们的信念或者兴趣相契合。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偏见在其传播过程中都是诚心诚意的。由于我们到处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一样的事物，因此我们便对其深信不疑。传播成见的人们越表现出真诚，越恰如其分地相信他们所提出的观点，这些成见就会越强烈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7）成见不仅充斥于互联网中，它几乎到处都存在。报纸、杂志、书（其中包括一些渊博的著作）以及政治辩论里都充满了成见。它们常常有相似的外表：它们并不全是空想的，而似乎都属于常识。我们看到它们大肆传播，它们被一些显而易见的功效装饰着。

（8）有些成见有一个事实基础，而从这个事实中发展出的却是曲解。即使有事实基础，但这些事实并不足以保证人们可以因此推出合乎逻辑与学理的结论。

作者使每个成见自成一个分析单元，先用一句或几句话概述了该成见的基本观点，然后，他用一篇文章的篇幅，试图展现表面现象的反面，即表象所掩盖的事实，引导读者发现，即使有部分事实的基础，但并不足以逻辑性地引向这样的成见；成见的产生与流行，恰是缺乏理性思考的结果。同时，他给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以引导读者们摒弃成见，更加具有理性，更加尊重事实，以便更好地理解相关的现象。准确地理解现象的成因，是有效解决问题、消除不良现象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此书初版于2007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表明公众了解并超越偏见的意愿是存在的。我们所翻译的是2017年1月出版的第七版。在本书中，一些在之前版本中出现的成见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美好的迹象——因为它证明该书体现出了它的教育意义，也证明了公众对偏见有所了解，并且表现出了批判意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成见，这也是作者继续更新这本书的原因。

法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对此书做出了高度评价。法国国内广播台

(France Inter) 赞扬作者具有“尖锐而中肯的眼光”。《巴黎人报》(Le Parisien) 评价说：“这是一本邀请每个人都运用其批评能力的书。”《回声报》(Les Échos) 如此称赞他：“巴斯卡尔·博尼法斯避免了落入简单化的陷阱。”

六

翻译的首要目标是“信”，即忠实原作。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性著作中，对于词语和术语的使用、句式和语态的选择，常常都是深思熟虑、精心选择的。因此，翻译应该最大限度地对其予以再现，而不是满足于传达意思。事实上，译者擅自改动原著的术语、语序、语态等，常常导致原文意思的被误译和误解。我想与本书内容相关的两个例子，它们也恰恰与法语译成汉语的实践有关。

第一个例子是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是”(Je pense donc je suis)。这句话被译成了广泛流传的“我思故我在”，从而使形而上的“是”改变为形而下的“在”(exister)。

从他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认为“思”(penser)与“是”(être)具有“同一性”(identité)，“个人身份”因而得以确立。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否定式：“我不思故我不是。”(Je ne pense pas donc je ne suis pas.)“不思”就“不是”，“同一性”和“主体性”(subjectivité)就无法确立，“身份”和自我(moi)也无从获得。因此，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又称“认同危机”)其实是“是”的危机：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不知道“我”是什么或者是谁，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里”(être-là)或“在上”(être-dans-lemonde)，不知道“我”值不值得活下去。[\[6\]](#)

许多人随口引用这句名言，却不明白这句话所蕴含的巨大思想价值和启发性，误译要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

第二个例子是萨特剧本中的台词“他人即地狱”。三十年前，有不少中国学者在批判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思想的时候，都指责他主张“他人即地狱”。其实，这句话是出自萨特戏剧作品《禁闭》(Huis clos)中的人物台词。以什么样的逻辑和理由，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话语视为作者本人思想的表达呢？另外，在这部戏剧的原文中，明明写的是“地狱即他人”(L'enfer, c'est les autres)，译者颠倒了主语和表语的次序，翻转了这句台词的重点所指。

萨特本人是无神论者，根本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他曾经做过

解释，说他想表达的是：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了，相互折磨，其实就已经生活在地狱里。他写这句台词，不是主张这种状态，而是呼吁人们努力进行改变。

我们从我思 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了别人。与笛卡儿的哲学相反，也与康德的哲学相反，当我们说“我思”时，我们是当着别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别人和对我们自己同样肯定。因此，那个直接从我思中找到自己的人，也发现所有别的人，并且发现他们是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认识到除非别人承认他如此（诸如说一个人高尚，或者说一个人欺诈或者妒忌），他是不可能成为什么的。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入，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情实况的。对于我的存在，别人是少不了的，对于我所能获得的关于自己的任何知识，别人也是同样少不了的。在这些情况下，关于我自己的亲切发现同时也揭示了别人的存在；面对着我的自由是他的自由；他有思想，有意志，而他这样做时，是不可能不牵涉到我的，必然是或者为我，或者反对我。这样一来，我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妨说是“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人就得在这个世界里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别人是什么。 [7]

萨特描写世界的荒诞状态，不是为其进行辩护或者吟唱赞歌，而是进行严厉的评判，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促使其作出自由选择，反抗荒诞，赋予人类以新的面貌：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做出选择，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改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呢？ [8]

所以，当有人说他“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 [9] 萨特拒绝接受这种指责。他将存在主义视为个人对其绝对责任的清醒认识和积极承担，因为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必须体现人类的新形象：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 [10]

七

本书的原著脚注较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在翻译时添加了译注。译注部分综合参考了各类资料，特此致谢。

2017年3月24日下午，博尼法斯先生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语系师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体育运动的地缘政治》。他侃侃而谈，

引人入胜，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激发了大家对地缘政治问题的强烈兴趣。由于他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我们未能做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在翻译这本书和校改译文的过程中，我们受益匪浅，对博尼法斯先生的见识和眼光产生了由衷的敬佩。我们希望中文版的出版，能够使更多的中国人受益，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现状，也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化体系，为推动人类进步做出与我们这个大国相匹配的贡献。

本书翻译工作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7年学术精品翻译项目（17XS04）资助，特此致谢。

最后，我们以一首诗来作结：

全球一体化渐深，
地缘博弈增裂痕。
愿以理性破成见，
共对危机求共存。

张弛

写于广州白云山下颐和山庄

[1] 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14页。引者对标点有所改动。

[2] 笛卡儿：《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初版，第1页。

[3] 19世纪的作家们注意到了这种人的存在。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屠格涅夫在《罗亭》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都描写了大谈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的人物。——译者注

[4] 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7页。按：本诗最初发表于1855年6月1日出版的《两世界评论》杂志，是总题为《恶之花》的18首诗歌第1首。

[5] 徐真华、张弛主编：《20世纪著作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5页。

[6] 徐真华、张弛主编：《20世纪著作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8—9页。

[7]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第21—22页。

[8]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第9页。

[9]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第3页。

[10]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第23页。

特朗普会让美国再度强大吗？

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吗？

穷人越来越多了吗？

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吗？

科技的进步将会避免全球变暖的发生吗？

书中所言即为真理吗？

“作者具有尖锐而中肯的眼光。”

——法国国内广播台（France Inter）

“这是一本邀请每个人都运用其批评能力的书。”

——《巴黎人报》（Le Parisien）